



2012 年 1 月 31 日创刊      2019 年 7 月 30 日第 134 期（增刊）

## 本期目录

### 《贵州文革专辑 2：兴义周一筑专辑》

史林一叶

#### 周一筑 我们亲历的兴义文革

写在前面

文革初期与“十七年”接轨

“毛主席革命路线”和“造反有理”

“西南的春雷”和兴义“三一九夺权”

“新生红色政权”制造的白色恐怖

李再含“解决兴义问题”后的复杂局面

从独山事件到“一二·一五”大镇压

龙广事件和兴义“一·一八”事件

蓝、张“支左”：造反派走向覆灭

1970 年：造反派从组织上遭摧毁

八县知青大抗争：兴义文革的余波

写在后面的话

生逢乱世

#### 周一筑 我的文革岁月

---

## 《贵州文革专辑 2：兴义周一筑专辑》说明

这是本刊发表的第二个由退休女教师撰写的地方文革专辑。前一个是第 119 期（2018 年 10 月 30 日）由黄玉梅女士撰写和整理的广西文革专辑 2。

贵州在文革中曾以“西南的春雷”而名震天下，但它毕竟是一个边远省份，这个边远省份有一个边远的地区叫兴义，当时兴义专署与中共兴义地委驻兴义，所辖有兴义、兴仁、盘县、普安、晴隆、安龙、贞丰、册亨、望谟等9个县。1971年1月1日盘县改为特区，划归六盘水市。文革结束后1981年在兴义地区的基础上建立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后兴义改县设市。

文革虽然是在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一号令下展开，但在不同地区依然呈现出许多不同的面貌，各有特色。在兴义这个小地区和小县城发生的文革就有许多不同于大城市的情况。感谢退休教师周一筑女士将兴义地区文革群众造反运动历史及作为亲历者的感受与思索写出来了，为地方文革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民间文本。

作者简介：周一筑（右图为近照），女，1946年7月生于贵州贵阳，1965年从兴义一中高中毕业，因“家庭出身”问题而高考落榜。文革爆发时正在做修公路的临时工。一年合同期满后返回兴义县城，投身到群众造反运动中，从此走上一条坎坷的人生路：造反，受压，上访，被通缉，逃亡，再上访，平反，再逃亡……走出监狱后，母亲和弟弟还在狱中，她已无家可归，当过搬运工、农村代课教师，1973年至1998年一直在兴义从事教育工作，1998年从黔西南州民族技术学院退休。此后她花了大量心血到处采访、搜集兴义文革资料与亲历者口述，执着地写下历史的见证。



---

【史林一叶】

## 我们亲历的兴义文革

周一筑

写在前面

作为兴义文革的亲历者，我们有责任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以下的回忆，反映兴义地区文革的全貌尚不完整，对一些相关的人物和事件的回忆亦有缺失和遗漏。不足之处，望有识者、知情者提出指正与补充。

本文所写到的兴义，不仅指文革爆发时的贵州省兴义县，而且指当时兴义专署与中共兴义地委(驻兴义县)及后来的兴义地区革命委员会管辖的兴义地区。

兴义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处，历来因地理位置特殊、多民族杂居的特点，极具战略意义。

兴义虽地处偏僻，但民风淳朴，且具备可贵的文化底蕴。仅在清乾隆年间，从1752年到1774年短短二十多年里，兴义就出了1位进士和4位举人。1906年贵州通省公立中学面向全省招生，兴义学生王文华、魏正楷、窦简之、高致祥、熊凤阶等13人投考，结果13人以第一名至十三名全部录取，震动贵州学界。

兴义现代史上出现过得到孙中山赏识、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1940年3月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的王文华（字电轮），还有和蒋介石长期既合作又有矛盾的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曾任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何应钦。

文革前十七年间，兴义的行政区划几经变更，到文革爆发前的1965年才重新恢复为兴义专区。虽然地处偏僻，也未能免遭一次次政治运动冲击。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时期，兴义饿死的人数超过兴义历史记载最严重的“甲子乙丑年”。“四清”运动中的1966年2月，在兴义地区安龙、兴仁、贞丰三县接合部的龙头大山发生所谓“百姓党反革命预谋暴乱”事件。株连数千人，有的被判重刑，其冤狱延续至文革。兴义地区“四清”运动的激烈程度在贵州省也是十分突出的，仅晴隆县1875名党员中受各种处分就达430人，新划地主、富农164户，四类分子129人，新定“暗藏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217人<sup>1</sup>。此数字仅为官方记载，并不包括运动中被整的全部人数。

十七年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在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新生“阶级敌人”的同时，也不断培养造就了大量担任“打手”的“积极分子”，并形成一个现行政治体制的附庸阶层。

兴义地区的文革，由于一直没有脱离十七年既定体制的控制，所以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兴义地区文革由于一直没有脱离“十七年”既定体制的控制，所以这里的“左派”与“右派”是延续“十七年”各种运动的“左”、“右”标准，而且其界限从一开始就非常分明，双方的观点也针锋相对，势如水火。

二、兴义地区的夺权，与贵州省被誉为“西南的春雷”的夺权完全不同，从“三一九夺权”到后来的兴义县等各县的夺权，都不是造反派夺原党政领导（“走资派”）的权，而是由兴义军分区组织原兴义地委主要人马及其专政工具公检法，加上“十七年”的依靠对象“积极分子”（文革初期的“保皇派”），在“革命

---

<sup>1</sup> 高华：《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

委员会”的名义下，用几个地专机关造反派做点缀的、换汤不换药的继续掌权。例如盘县以公检法为主体的“四一四夺权”，《夺权公告》上就公开宣布他们是镇压了“右派”（即造反派）之后的夺权。其后虽有几个造反派头头象征性地短暂进入革命委员会，最后仍无一幸免地被关押和受各种迫害。

三、由于以上原因，兴义地区文革呈现出这样一种局面：造反派人数众多，但政治力量薄弱，反专制、争民主、求公正的斗争意志坚决，而斗争环境十分严峻、恶劣。所以兴义文革中，有的是对造反派的残酷镇压，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武斗。

### 文革初期与“十七年”接轨

1966年6月1至8日，中共贵州省委召开第二届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讨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指示和“五一六通知”，研究制定《贵州文化大革命的工作意见》，省委以贾启允为主组成文化革命小组，要求各地、州、市都要成立文化革命小组，县委要有专人负责。

兴义各单位成立文革小组，还有上面派入的工作组，依靠下面党团员、出身好的“积极分子”开展运动。所有做法都与十七年来的政治运动一样。

文革的斗争对象和斗争形式也与历次运动相似，除紧跟上面精神，找几个人来充当“小三家村”之外，基本上是延续十七年历次运动的做法：挖三代、查历史，结合现实，根据需要，罗织罪名，抓各种“牛鬼蛇神”，批斗形形色色的“反革命”。

农业局干部康后元写的小说被打成“大毒草”，罪名是“为封资修擦脂抹粉”；1965年贵大历史系毕业、刚分到兴义师范耕读学校的林建增，因其父是原贵阳《大公报》副总编，也被安上莫须有罪名抓出来整，被逼几乎自杀。

省重点中学兴义一中，自然是运动的重点，抓出的“反革命”有教师罗重民、周瑞琮、花瑞泉、高宝龙、毛光平、刘博文、蔡汝鼎……

老教师罗重民的罪名是“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兴（义）安（龙）防奸保密五人小组成员”的“中统特务”身份，依据的居然是一张抄家抄到的买卖土地的契约改造而成。

女教师周瑞琮的罪名是“国民党代理县党部书记”，“和党争夺下一代”，“长期以来，利用师生关系，与入伍到我空军部队的学生保持联系，收集记录我空军基地和飞机类型、效能等军事情报。”她本人学生时代的照片（因有当年学校校长的题字），和她的学生包括“入伍到我空军部队的学生”等给老师的上千封信件和照片，都作为罪证在“罪行”展览会上展出……

抓“反革命”的形式是历次政治运动传承下来的：逼迫交代“罪行”、搞“罪行”展览会，开各种批斗会武力批斗，限制人身自由关黑牢……上至地、县各机关、单位、学校，下到街道各居民点，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各学校组织红五类“红卫兵”，与街道办事处积极分子配合，大肆抄家。主要抄家对象起初为原兴义解放时期的地方大户人家，比如兴义县原参议长、民主人士、解放后曾任兴义县长的徐崇儒……后来抄家范围不断扩大，甚至扩展到农村，所抄物品先是黄金、银元、鸦片、古董文物等，后来抄走的东西包括日常生活用品……当时“破四旧”中砸烂、破坏的地方古迹（建筑、牌坊等），无法统计。

1966年8、9月，官办红卫兵和街道办事处积极分子配合的“破四旧”等如火如荼，打“反革命”、抓“牛鬼蛇神”愈演愈烈。城关第四办事处一位家庭妇女娄××，只因人长得漂亮，丈夫在外地工作，生活较舒适，便为积极分子忌恨，被街道办事处打成“百姓党美女团”成员，被逼自杀。

### “毛主席革命路线”和“造反有理”

1966年8月28日前后，首都南下串联学生到达贵州省城贵阳，“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开始在贵阳响起。9至12月，贵阳地区各大、中学校学生到首都和全国各地大串联。在这期间，贵阳师院“六六”战斗团、贵阳工学院“九一五”、贵阳医学院“二二六”等红卫兵串联来到边远的兴义山城“点火”，带来领袖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清华大学蒯大富反工作组的文章等在官方大报上看不到的信息，群众开始动起来，看串联学生贴出的大字报，收集外地来的传单，自发集会，要求平反……特别是那些在文革初期被工作组、文革小组安上各种罪名、遭到不同程度打击迫害的人们，听到出自伟大领袖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又何其毒也”这些话的时候，犹如久旱逢甘霖的禾苗，那是多少人积压心底已久、想说而不敢说出的话！人们这才知道了原来党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世间所有的罪恶找到了根源，人们把十七年来直到文革初期所看到的、所遭遇的不公都归于“资产阶级司令部”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他们的反，当然是“造反有理”！

人们开始行动了，第一步是找当权派、工作组、旧文革平反，有的是要翻案。例如兴义一中的高毓老师，文革前就被宣布为“历史反革命”，这时她也提出自己的冤情，要求平反——她的问题在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时期才得到解决。

可见文革初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矛盾，已经与十七年各种运动产生的矛盾联系起来，由此可知文革造反派社会根源的深厚，“造反”这两个字的

分量之沉重，以及要扑灭、踏平这个力量需要施加的暴力程度之大。

这也正是整个文革远超发动者的掌控，延长之久、反复之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文革的发动者始料未及、也是后来的不少眼睛只看着高层“宫斗”的文革研究者所忽略的。

思想的解放，必然带来行动的解放。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都在行动，众多人的行动，就成为运动——群众造反运动。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有别于十七年以来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的运动，民众显示出和十七年以来的各次运动不同的、不愿做工具和信众的角色意识，即运动主体性的产生。

兴义教育界的群众组织“红色风暴”成立了，手工业工人的“铁流工人战斗团”成立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兴义造反司令部”诞生了！“八八经风雨红卫兵”、“见世面红卫兵”、“红闯兵”……各种各样的群众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受害者找造反组织要求帮助平反，造反组织找当权派要求交出整人的“黑材料”，各种群众集会，大字报、大辩论……兴义城中心的街心花园搭起了集会台子、围起了大字报栏——大字报栏前有看大字报的当即在上面批字，表明自己态度和看法，还有的直接在大字报前就展开辩论，宣传车每天都在发布新鲜的消息并散发传单……

11月3日，贵州省委发了一个坚决进行平反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的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而兴义的地方的平反工作一直未能进行。

### **“西南的春雷”和兴义“三一九夺权”**

此时的省城贵阳，聪明的李再含选择了另一条符合运动大方向的道路。与原贵州省委书记贾启允“持有不同意见”的李再含，先后向贾启允写了六封信，继而成为省文革小组成员。接着，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亲自批示召李再含进京，由中央文革小组与他面谈，部署贵州夺权，中央马上予以承认并高度评价为“西南的春雷”。

当“西南的春雷”在贵阳上空响起的时候，也正是兴义造反派厄运即将到来的时候。

这时在“造反有理”的旗帜下，造反派以“兴义造司”（全称为“毛泽东思想兴义革命造反司令部”）为核心的大联合很快形成。县城内老百姓大多数都是“造司”观点。

兴义军分区政委张星炳从一开始就天然地站在造反派的对立面。

兴义军分区与兴义地区的地方党政领导有先天的联系（军分区与地委高级官员相互兼职），军队介入地方支左后，军分区即通过各县武装部控制各县，通过

民兵组织控制到区、乡（公社）。当相信“造反有理”的群众把矛头指向当权派，使地、县两级地方党政机关陷于瘫痪，地委书记冉砚农靠边站后，兴义军分区政委张星炳仗着“三支两军”的权力开始行动。保守派在县城内几乎没有势力，县武装部便在城郊以农村民兵为基础，成立了“红旗大队”、“水库大队”等以地方行政区域为单位的官办组织。

兴义下午屯当时尚属兴义城近郊。下午屯是历史上著名的“刘氏庄园”所在地，清嘉庆年间，兴义下午屯刘氏以办团练迅速崛起，以后出了民国初年贵州政坛显赫一时的督军、省长刘显世和滇黔边务督办刘显潜。因而刘家在兴义是首屈一指的大地主，在贵州是有名的大军阀。下午屯区也就成为兴义县十七年来“阶级斗争”教育的重点和基层政权的标杆，自然也是各种运动中官方树立的典范。这时便由县武装部李振义、韩品禄、民兵武装营长王振生亲自组织了“卫红司令部”，成员是下午屯区各公社基干民兵。

当时下午屯有一个“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兴义地区“四清”总团为培养农村基层干部而设立的，学员当然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弟，作为“四清”后充实农村基层的后备干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制一年，学员共127名。

文革群众造反运动开始，外地学生串联到兴义，兴义学生也到外地串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部分学员也加入了串联队伍。这些单纯的农民子弟在串联中开阔了眼界、启迪了思想，回来后，以刘云志、周兴武、刘启华为首的几个年轻人发起，组织了一个自发的群众组织“七一六”造反兵团，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遍及下午屯区各公社。

“七一六”造反团也到城内参与了市民的炮轰、火烧地、县委的造反运动，自然地加入了“兴义造司”的造反行列。

这样，“七一六”造反兵团这个真正的贫下中农自发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就成为了以民兵为基础，由兴义军分区、县武装部支持的官办保守组织“卫红司令部”的对立面。

兴义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也在军分区的支持和运作下成立了保守组织；运动初期的官办红卫兵也纷纷打出了新的旗号：兴义一中“迎春雷”、兴义二中“新曙光”……兴义公检法也成立了保守组织“政法总部”，它不但是兴义军分区政委张星炳的支左对象，而且是张星炳炮制和支持的“三一九”夺权的中坚力量，后来又成为“三一九”地革委“红色政权”的专政机器。

兴义文革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这样的局面：阵线分明；力量悬殊。

所谓阵线分明：

造反派——以“造司”为代表，主要是十七年历次运动的打击对象和文革初期所谓“资反路线”的打击对象及其子女、亲属、社会关系。此外，城内“阶级

成分”好的下层市民和郊区“贫下中农”等十七年来非利益集团阶层的广大群众中富于正义感与同情心的人们，即使没有参加“造司”，也自然地站到“造司”一边，属于“造司”观点。

保守派——一开始是兴义军分区政委张星炳支持夺权的“三一九”派，包括三种成分：一是十七年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文革初期执行“资反路线”，打“反革命”、抓“牛鬼蛇神”、“破四旧”、抄家的执行者、积极分子，文革初期的官办“红卫兵”；二是作为“资反路线”抓人、捕人专政工具的公检法；三是城郊和下午屯被军分区通过县武装部控制的民兵组织。

从力量对比来看，无论城乡，造反派“造司”方面的人数都占绝大多数，几乎占城乡人口90%的压倒优势，但造反派却无权，得不到地方军政权力机关的支持。

1967年从2月份开始，兴义城内空气越来越凝重。军分区高音喇叭的响声又变得如同文革初期，把不久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和压抑下解放出来的造反派诬为“1966年冬天跳出来，配合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利用混进群众组织内的反革命分子、‘四清’下台干部、劳改劳教释放犯及表现不好的地、富、反、坏子女”，罗织了种种罪名，宣称要“一网打尽”<sup>1</sup>！

“三一九”夺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兴义军分区政委张星炳直接支持、甚至可以说是一手炮制的。

夺权主体是“政法总部”、“地区造反总部”、“地委机关联络站”，其中“政法总部”是文革初期“资反路线”时旧文革、工作组打“反革命”的专政工具，“地区造反总部”是地区机关群众组织，应该算造反派，但因成员地位的关系，观点偏右，与“兴义造反司令部”不是一个体系，而“地委机关联络站”的头头赖碧如的丈夫就是兴义军分区的政治部干部。

4月10日，兴义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5月5日，兴义县革命委员会立。

这两级革委会的掌权主体，都是原地、县委机关及公检法人员，其中不少是文革初期执行“资反路线”时的“打手”，以及听命于武装部的农村民兵“卫红司令部”的代表。尤为可笑的是，兴义县的“夺权”怕被造反派群众发现，是在夜间偷偷交接进行的，因此被群众称为“偷权”。

“夺权”前后，本应是夺权主体的造反派组织被镇压，“造司”被打成反革命组织，造反派各群众组织头头兰志忠、林嘉伟、王清治、廖崇志、罗德芳、莫梅英等被抓，罗安义等被批斗；各单位“造司”观点的成员遭到各种形式的迫害……

---

<sup>1</sup> 《兴义地区补台代表大会材料汇编》）



有资料记载：1967年2、3月间，贵州全省有52万群众的218个革命群众组织被打成“反动组织”，有2000多人被关进监狱。这就是贵州的“二月镇反”<sup>1</sup>。这个统计不知是否包括了贵州省的兴义地区。

### “新生红色政权”制造的白色恐怖

地、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兴义地区从地、县各单位到城市各街道办事处、农村各乡（公社），均恢复了文革初期的格局。“资反路线”时期形形色色、各种名目的“阶级敌人”又回到了原来的地位，各种“帽子”又纷纷回到那些人的头上。兴义一中的“经风雨”、兴义二中的“见世面”的学生们，当了几个月的“红卫兵小将”，这时又变成了“坏头头”、“地富子女”（相比以后的种种可怕的罪名，这可是最轻的一项桂冠）。

（下图：兴义一中“八八经风雨”红卫兵1968年的一次合影。）



当4月份开始，兴义被镇压下去的造反派从外地传来的小报、传单上得到反击“二月逆流”的信息，与此同时，贵阳“四一一”学生运动的消息也传到了兴义。街上又见造反派的大字报、传单，被镇压的“兴义造司”蠢蠢欲动，一些人迅速串联，恢复原战斗队活动，一些人奔走相告，并组织到北京告状，还有一

<sup>1</sup> 邓振新：《贵州风云》，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香港，2014年，第145页。

些人到省城贵阳参与了“四一一”的抗争活动，如兴义下午屯“七一六”的头头刘云志，仗着一身血气，只身跑到贵阳，通过在医学院的亲戚，参加了冲击省红代会的“四一一”行动……

当“四一一”运动在贵阳兴起时，正是兴义军分区镇压群众造反运动，策动“三一九夺权”及各县保守派“夺权”之时，因此，兴义地区各县造反派就自然地加入了“四一一运动”。

1967年6月17日晚，盘县爆发了一场800多人的大游行，抗议“四一四革委”把造反派“红联”打成“反革命组织”，要求给“红联”平反。“四一四革委”在“誓死保卫红色政权”的口号下对游行进行了镇压。盘县中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红旗兵团”和全县的造反派一起进行了不屈的抗争。

7月份，贵阳“四一一”与李再含的斗争如火如荼，在偏远的兴义山城，兴义“造司”的“经风雨”红卫兵静坐解放桥（经过解放桥便是兴义军分区所在地），要求释放“三一九”抓捕、关押的造反派头头。兴义城乡群众广泛支持，纷纷把水和食物送到解放桥，甚至有年迈的白老妈妈也去慰问静坐学生，同时用切身经历和身边事实，揭发“三一九”镇压群众的种种罪行。“经风雨”静坐解放桥的行动影响越来越大，城郊和马岭区持“造司”观点的贫下中农群众组织“全无敌”也赶到解放桥声援和慰问静坐学生。

当《四一一战歌》响彻省城贵阳的时候，兴义《造司战歌》也在和军分区一河之隔的解放桥头响起：“巴谷山下红旗乱，/湾塘河水波浪翻。/高山流水放声唱，/歌唱山城造司的战友，革命的好战友……”

随着贵阳李再含对“四一一”运动的镇压，形势日趋严峻。兴义“经风雨”被迫结束静坐，退出解放桥。罗安义、苏祖华、孙仲达等六人由兴义乌沙逃往云南方向，准备绕道去北京告状。他们走到岔江，便被“三一九”地革委政权布置的网络发现，在云南和兴义交界的长底被当地民兵抓捕，他们被民兵用水泡过的树皮进行捆绑，树皮勒进肉里，罗安义们直到今天手臂上还有当年伤痕。此外，还用稻草沾上牛粪塞进他们嘴里……

罗安义、苏祖华等六人被押回兴义后，罗安义被关押在兴义一中教学楼上的教室，由“三一九”支红派红卫兵“迎春雷”的学生看管。苏祖华等先被释放，就考虑如何救出罗安义。这时正临近中秋节，苏祖华带着一些点心，到关押罗安义的教室去探望，恰巧看守的“迎春雷”学生正好是苏祖华的同班同学，有的还是他当年介绍入团的，经苏祖华做工作，看守便同意他给罗安义送点心。苏祖华和罗安义见面后，便商量了营救方案。当天夜间，苏祖华把一楼的天窗打开，罗安义从二楼对应的窗口翻出来，脚踩住下边一楼的天窗边框，然后跳下。这样，罗安义安全逃脱，转移到城内“造司”群众家里躲避。

白色恐怖继续笼罩兴义山城。地革委成立了专业武斗队“107兵团”（公路总段）、“08”兵团（兴义运输公司）；县革委成立了“卫红司令部”（下午屯农民），对“四一一造司”的头头和骨干大肆抓捕。罗安义成功逃出后不久又再次落入魔掌。

“四一一兴义造司”被再次踏平后，1967年9月13日，被抓捕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数十人被五花大绑、嘴含稻草游街，然后又被押到人民体育场批斗。兴义山城腥风血雨、黑云压城。唯有夜晚，巴谷山下、湾塘河畔，不时传来《造司战歌》的歌声……

省城贵阳的“四一一”遭到李再含为首的省革委“八月踏平”后，大批“四一一”学生、工人、干部被迫外逃。1967年8月30日，“贵州四一一赴京控告团”在北京地质学院成立，又在首都红代会热情支持下在北京成立了“四一一驻京联络站”。逃散到全国各省的“四一一”也得到各地造反派的积极支持，很多地方都成立了“贵州四一一联络站”。兴义“四一一造司”组织被取缔、打垮，但“人还在，心不死”，有的跑到全国各地，有的到了北京，并参加了贵阳“四一一”的活动。几十年后相聚的贵阳“四一一”老人，还记得当年的战友“大兴义”（周建华）、“小兴义”（郑家胜）。

兴义地区各县，造反派与兴义军分区炮制的“三一九地革委”及下面各个“伪革委”的斗争不断。

1968年春节过后，盘县造反派“六一七红联”的斗争从大字报、大批判发展到学生的静坐示威，要求为被镇压的“六一七红联”平反。盘县各个阶层的造反派群众走上街头，支持学生的静坐行动。造反派力量不断壮大，就连“四一四革委”的保守组织“总指挥部”方面，也有群众反戈一击，倒向造反派。

1968年3月16日一早，“四一四革委”“总指挥部”的核心“政法兵”，出动了全副武装的人员满街抓捕、毒打手无寸铁的“六一七红联”学生和群众，甚至开了枪……然后是挨家挨户的搜查、抓捕、毒打、游街、关监狱——欲将“六一七红联”置之死地而后快……

整个兴义地区各县基本如此。

### 李再含“解决兴义问题”后的复杂局面

李再含为建立他在贵州的“独立王国”，必须把兴义地区控制在手中，必然和兴义军分区张星炳产生矛盾。1967年11月13日，李再含发表了有关兴义问题的“一一·一三讲话”，认为兴义地区及各县是保守势力夺权，是死水一潭，提出对兴义地区已经建立的革委会要分别采取“改组、无效、否定、重建、接管”<sup>10</sup>

字方针，要害是向兴义军分区张星炳“三一九体系”夺权。为此，兴义地区“造司”观点的、包括各县的造反派，便成为李再含“敌人的敌人”。兴义地区被镇压的造反派，希望得到中央文革和省革委的支持，自然也欢迎解决兴义问题。

但是，从一开始，兴义地区造反派和李再含的目的就是不一样的。于是兴义从地区到各县，造反派内部又不同程度地分化成两派：坚持造反初衷的“罗（安义）、王（清治）、林（嘉伟）派”（四一一），和拥护李再含的“廖（崇智）、莫（梅英）派”（支红）。这就是兴义地区文革与贵阳地区文革不同的地方。

1968年1月21日，李再含任命蔡坤为兴义地革委副主任。随即李再含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各县“解决问题”。

2月3日，李再含将他《关于解决兴义问题几点意见》在兴义地区推广。李再含的目的不过是把张星炳控制的兴义地区纳入他在贵州的“独立王国”；这一点和“兴义造司”广大群众的目的本质不同的。“兴义造司”广大群众提出“彻底改组地革委”和“坚决砸烂县革委”的目的显然是很难实现的。即便后来罗安义、王清治、林嘉伟等也有的进入了革委会，但因为他们坚持造反的初衷，而没有成为李再含体系的工具，终究未能逃脱成为军政集团阶下囚的命运。

这种情况在中国的文革运动中普遍存在，这是文革延续十年之久，“天地翻覆”、“天下大乱”却难于达到“天下大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值得研究。

5月1日，兴义地革委改组，蔡坤任主任，李崇富、廖崇智任副主任，张雨和为结合干部；梁大伦、莫梅英……任常委，罗安义、王清治任委员——后出于收买、分化贵州“四一一”的目的，李再含点名把罗安义提为常委。

5月25-31日，兴义地革委召开常委扩大会，部署开展“三反一粉碎”（李再含此时亲自点名提罗安义为常委）

李再含在兴义地区“既打‘左’（‘四一一造反派’），又打‘右’（‘三一九’派和各县武装部支持的保守派）”，问题不能解决，矛盾日益激化。兴义地区的文革运动呈现出三股势力博弈的状态。

兴义城内，“四一一兴义造司”造反派虽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但面对的是李再含（省、地革委）、张星炳（军分区及其操纵的“三一九”）两派来自官方和军队的压力。为免遭“踏平”，“造司”成立了卫红组织“六六兵团”（设在兴义一小内），团长刘达磊，但没有武器。城内武斗空气日益紧张。

“三一九”派在城内几乎无人，但在城郊有“卫红司令部”民兵，各县保守派有军分区、武装部提供的枪支弹药。“三一九卫红司令部”在兴义城边大扁山设立许多据点，但因谣传广西“四二二”派给了“造司”两车武器，他们也不敢贸然进城，只是在夜里派出武装人员进城侦查，与“造司”巡逻人员时有冲突。

李再含支持的地革委虽有武器，但他们扶植的“廖莫派”几乎就是个空架子，

地、县各单位均无力量。李再含派李崇富控制的兴义地革委，用成立“工筹”（工代会筹备组）的名义，靠兴义运输公司“08兵团”、兴义公路总段“107兵团”的武斗力量支撑。

## 从独山事件到“一二·一五”大镇压

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便相继发生了独山事件与“造司”抢枪事件。

独山是三面环水、只有一条道通陆路的小山村。1968年7月21日下午，兴义下午屯民兵荷枪实弹，以民兵演习的名义开往独山。在距独山不远的粮库附近与独山农民接触，打听“四清下台干部陈才应”在何处。陈才应是“造司”观点，家住独山。22日夜晚，大批武装民兵就以抓“四清下台干部陈才应”为名闯到独山。因头一天的接触而引起警惕的独山村民决不容许外来武装侵犯，奋起反击。当晚月黑风高，来犯民兵地形、道路都不熟，见占不了上风，被迫回撤。时值涨水季节，而独山三面环水，只有唯一的一条陆路通道，有民兵在慌忙奔逃中落水，第二天才发现了河中的四具民兵尸体，身上还挂着武器。

第二天一早，有参加围攻独山的民兵彭高云私下把情况告知了下午屯“四一一兴义造司”方面的“七一六”兵团负责人刘云志。“七一六”一方面到独山探望昨夜遭到突袭的众乡亲，一方面了解具体情况，并向“四一一兴义造司”作了报告，“造司”紧急开会，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大阴谋：针对造反派的镇压马上要开始了。这一事件无异于给兴义城内原本火药味十足的空气划了一根火柴。

7月25日，下午屯武装民兵赶到独山（这次不用选择偷偷摸摸的夜间行动了），一阵打砸抢后，打着下午屯民兵旗号的武装人员，押着陈才应家的人抬死尸，先到“卫红司令部”的大本营下午屯造声势，然后抬着死尸进城游街。“卫红司令部”民兵高喊着“报仇……”“血债……”之类口号，从铁匠街进入场坝，到达城中心。

当天兴义城内阴风惨惨，日月无光。城内绝大多数都是“四一一造司”观点。此时城中心场坝上空无一人，周围各街道居民家家大门紧闭，有人胆大爬到房上观看。当抬死尸队伍游行往兴义县手工业管理局宣化街口，房顶上有人便往下丢石头，民兵游行队伍顿时大乱，被迫抬死尸的陈家农民也乘机逃走。四具民兵尸体横尸街头……

面对武装镇压的威胁，“四一一兴义造司”决定以武装对武装，抢枪自卫。当“四一一兴义造司”的人涌到县武装部的武器库时，那里居然毫无防守。直到一支支的枪、一箱箱的武器“抢”到手，人们才发现：抢到的大多只是枪壳，既无机柄，也无子弹。他们这才知道无人防守的原因。这时有人认为上当了，但更

多的人还是沉浸在盲目的亢奋之中。后来，“经风雨”苏祖华受命带部分无柄的枪支绕道去安龙换回一些机柄和子弹。

大镇压的时机到了。军分区、地革委的高音喇叭每天都在宣读“七三”、“七二四”布告，宣布“四一一兴义造司”的“七二五”抢枪为“反革命抢枪事件”，勒令“造司”交出枪支和抢枪人员。

一场针对“四一一兴义造司”的收缴武器行动开始了。到手的残缺的和部分勉强凑成的枪支，这时变成了烫手的山芋，明知“交枪就是交命”，然而不交枪就是“反革命”。

引发“独山事件”的“四清下台干部”陈才应，在到北京告状的路上被抓。紧接着，小小的独山村被搅得鸡犬不宁：独山陈才应家的陈王氏（陈才应八十多岁的老母亲）、陈述应、陈朝典被抓进监狱，未进监狱的被抓到下午屯临时集中关押，由兴义军分区教导队管理，下午屯民兵看管。

9月7日，“造司”的“六六兵团”、“红闯兵”被取缔，“红闯兵”负责人王清亚、周一筑被全国通缉。整个“四一一兴义造司”活动转入地下，“红闯兵”的窦新民等，“八八经风雨”的周建华、苏祖华、黄省三等，“见世面”的严德寿、陈祖吉等，“反到底”的罗平元……不屈的“四一一兴义造司”人仍在斗争。

城中心场坝上的手管局成了“四一一兴义造司”集中的地方，每天都有人在此聚集，写大字报、大标语揭露地革委，交流和汇集各方面的信息。县手管局成了李再含的兴义地革委的眼中钉。是钉子就一定要拔掉。

1968年12月初，地革委李崇富借成立县工代会筹备组，在县商业局大楼设了县工筹办公室，占据县商业局大楼，以控制县手管局。12月12日，李崇富召开会议，进行大镇压的战斗布置。

12月13日中午，召开各兵团负责人会议，布置大字报造舆论，给手管局内的“造司”人员安上“反革命”、“二月逆流”等罪名。

12月13日晚上，召开兵团负责人会议，作镇压动员，布置各团队要做好一切准备，听候电话通知。当夜控制了邮电局电话总机。

12月14日晚上七点左右，县革委李崇富等在“107兵团”召开会议，李崇志宣布梁大伦为总指挥，伍国玺为副总指挥，当场交代任务：绝不准那些暴徒冲出去！然后李崇富就去打电话向省革委请示报告。据史料记载：

…… 决定十五日三点钟包围县手管局。按照策划调集人马，荷枪实弹按时出发，分三线包围县手管局。第一线由省建“1·19”负责，强攻直入；第二线派两个班掩护第一线，每班机枪一挺；第三线由各团队把守各街道。具体部署：

1. 省建（“1·19”兵团）由×××带领三十多人，从（县手管局）后门攻打楼上：爬上房顶，从上往下压；

2. 专建队（“107”兵团）由×××带领七十多人攻打（县手管局）前大门；

3. 总段（“107”兵团）由伍国玺带领三十多人把守四个街口；

4. 兴运司严德义带领五十多人把守环城路；

5. 县医院至电影院由合办车场×××和县工筹的曾××带领部分人员把守；

6. “107”兵团派一个班占领百货大楼，有机枪一挺；

7. 派两个班占领商业大楼，有机枪一挺封锁后门，掩护省建进攻。指挥以广播唱片为信号，放“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为进攻信号，放“大海航行靠舵手”为撤退信号，出勤人员用白毛巾扎在右手作为标记。

地革委内，以李崇富的房间为指挥部，参加指挥的有李崇富、廖崇智、梁大伦、聂××，省革委徐××、张德茂、钟仁伟，联络员是总段的×××、×××、兴运司的×××。<sup>1</sup>

12月15日凌晨三点半，地革委的各路人马按部署纷纷出动，宣传车开到县手管局正门，先是宣布“四一一兴义造司”的“反革命……抢枪……”等“罪行”，然后广播喊话，勒令：“赶快缴枪！周一筑、周建华、邓国强出来投降！”（他们情报有误，当晚周一筑并不在现场。）

接着，省建“1·19”有人爬上屋顶，开始是用长凳脚做支架绑上轮胎胶圈的“大弹弓”，以砖头、石块当弹丸向县手管局楼内发射。守护据点的“四一一造司”人员为制造声势，开始吹响军号，同时大家一起呐喊，并敲击楼板发出响声……一部分人员转移到三楼，透过玻璃窗观察外面的进攻情况。砖头、石块不断弹射进窗内，守在窗前的窦新民脸上被打伤几处，又被子弹击伤眼睛，其他守卫人员躲开射击，仍坚守阵地，用石头、沙包等还击。

不一会儿楼上响起枪声，武装人员在手管局三楼对面的围墙上打了洞，将机枪架到墙洞处，向手管局射击。“四一一造司”守卫人员仍然顽强坚守，毫无退意，李崇富又将省建一个班调到县花纱布公司二楼上，充实兵力加强进攻。到次日凌晨四点钟左右，百货大楼机枪开始对准手管局“造司”据点射击……

负责从后门进攻的县工筹人员在手管局后门挖开一个墙洞，埋下炸药包，又在前门也放了一个炸药包，炸楼！

前门被轰开后，武装人员冲进去，对守楼的“四一一造司”人员进行抓捕，同时进行搜身和毒打。这时，闻讯赶来的群众也涌进大楼，领头的是七十多岁的白妈妈。进来的群众一边阻止攻楼人员的暴行，一边愤怒地高喊：要打就打我们！

---

<sup>1</sup> 兴义地区革命委员会补台代表大会秘书处编写《彻底砸烂李再含的独立王国——兴义地区革命委员会补台代表大会揭发、批判材料汇编》，1970年5月。

打这些学生算哪样！白老妈妈抓住一根枪杆，挺胸说：来呀！朝我这里打！老娘死也死得了……就在这混乱之中，部分守楼人员得以逃出，但坚守大门的“经风雨”黄省三等全部被抓。

枪炮攻击中，死守在三楼的二中“见世面”红卫兵罗源平被击中头部，脑浆迸出，当场死亡。周建华、邓国强、窦兴明、刘功国等从三楼翻窗跳下，被楼下群众掩藏到家中。几个“四一一造司”人员翻墙逃进军分区在宣化街的一处家属宿舍，结果被宿舍内“三一九”派发现，马上被武装人员抓走。被抓“四一一造司”人员先遭一顿毒打，然后被架着拖走，过宣化街丁字路口新马店时，押送的武装人员居然把受伤的“四一一兴义造司”俘虏推倒在地，拖拽而行，伤员头，就在石子路上碰撞！路边的群众再也看不过去，有人大喊：“救人！”原来躲在暗处的“四一一造司”人员和群众纷纷涌上街头，押人的暴徒使用冲锋枪向群众扫射，冲在前面的“造司”严德寿身中四弹（右小臂、右肩膀、右胸、左上腹）倒地，其他群众受枪伤者众多。当人们把严德寿送到医院，已经无救。

逃出手管局的“造司”人员，好多仍然未逃出武装镇压的魔掌：吴宏龙死在席草田，邱结巴死在场坝台子后面，挑水人张志清被打伤肋骨……伤者难以统计。

整个事件中，除打死四人，打伤多人外，被抓进“107”的三十多人，严刑拷打，惨不忍睹……所谓收枪，却一支枪也未收到。<sup>1</sup>

“红色政权”的暴行撕下了它最后的面纱，被屠杀者的鲜血擦亮了人们的眼睛。“一二·一五”一个月后，一场自发的、庄严隆重的纪念大会在一个月前陈列过死难者遗体的兴义城中心场坝举行，冒险前来参加大会的上万人，有八十岁的长者，也有十多岁的娃娃。当天天降雨雪，万众同悲，天人共愤！

## 龙广事件和兴义“一·一八”事件

还在镇压“四一一兴义造司”之前，李再含主持的贵州省革委与他改组的兴义地革委，已经与兴义军分区及武装部操纵的“三一九”势力时有摩擦，其中最大的一次冲突是1968年9月16～18日在安龙县龙广区爆发了严重影响李再含前途的“龙广事件”。当年由部队人员编写的有关龙广事件真相的调查报告和文革之后官方史志或党史大事记中对此事件的记载，往往对事件的真相语焉不详，只称该事件是李再含擅自动用部队，由省革委副主任康岩中率省军区独立师一个连（一说两个连一个排）到兴义安龙县龙广区“攻打当地群众组织”或“武装镇压

<sup>1</sup> 兴义地区革命委员会补台代表大会秘书处编写《彻底砸烂李再含的独立王国——兴义地区革命委员会补台代表大会揭发、批判材料汇编》，1970年5月。



群众”。后人不了解情况，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又是李再含在镇压“四一一”派中的一桩罪行，其实并非如此。

这一事件的起因是，因安龙县龙广区的“三一九”派“指挥部”并不服从李再含“处理兴义问题”的有关措施，桀骜不驯地提出要建立“安龙自治县”，挑战李再含的“西南春雷”。李再含动用军队去“攻打”、“镇压”的就是这个当地的保守势力，而不是“四一一”造反派。在镇压“四一一”这一点上，李再含与兴义地区的“三一九”是一致的。

以后在李再含下台、安龙县龙广的“三一九”借清算李再含之势重新掌权后，所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四一一兴义造司”的继续镇压。他们根本不需什么关押、审判，直接在他们的掌权大会上把“四一一”造反派头头抓出来就枪毙，有如五十年代初期镇压地主或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

因军内反李再含的势力将贵州兴义地区的“龙广事件”作为打垮李再含的一枚重磅炸弹，后来贵阳“四一一”也把它作为李再含的一条重要罪状加以声讨，无形中掩盖了兴义地区真正的受害者始终是“四一一”造反派这一历史真相

1968年底兴义城内“四一一兴义造司”惨遭“红色政权”镇压后，李再含扶植的地革委与军分区、武装部支持的“三一九”保守势力矛盾更加突出。兴义地区各县武装部支持保守势力“农村包围城市”。在盘县，原武装部扶植的“四一四革委”被李再含改组后，其骨干由县城转移到农村。县武装部赵金旺给他们发放枪支弹药，经常有小股武装在城边、甚至潜入城内活动。

1969年1月6日开始，盘县保守势力“四一四”民兵和农民在盘县城外几处路口设置哨卡，控制路口，对盘县城进行包围。城外不时响起枪声，城内武斗空气紧张。

1月11日天刚黑，县武装部支持的保守势力组织了800人的民兵和农民武装向盘县山城发起进攻。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呐喊声震天。指挥者县公安局局长许成材、原县委副书记马广理、政法兵头目康阳春——兴义军分区和县武装部支持的“四一四夺权派”原班人马！

这就是有名的盘县“一·六事件”，包围盘县城长达7天之久。直到1月12号由李崇富率领的地革委武装平复。

盘县“一·六事件”是兴义军分区、武装部支持的“三一九”势力与李再含省、地革委势力的斗争，双方既有现实的利益冲突，又有不同的军内背景，与他们镇压兴义造反派的“一二·一五事件”性质完全不同，但是由于兴义地区三股势力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包围盘县城长达7天之久的盘县“一·六事件”中，真正保卫盘县山城的指挥者和战斗在一线的保卫者，却是盘县的“四一一”派，主要是盘县中学的学生张光来等。

类似事件在兴义地区各县都有发生。但由于李再含“解决兴义问题”对各县“改组县革委”加入了造反派代表，使此类事件呈现出极易引起误解的复杂性。

总之，这一时期兴义地区各县发生的类似事件，必须放在兴义地区三股势力错综复杂的矛盾背景上来认识。李再含倒台后蓝亦农、张荣森到贵州主政的“补台”，又完全颠覆李再含“解决兴义问题”建立的地、县革委，使得“三一九”势力完全复辟。

1969年兴义的“一·一八事件”，就是在兴义地区三股势力错综复杂的矛盾背景下发生的。

“四一一兴义造司”被镇压后，兴义军分区支持下的“三一九”开始活跃。1969年1月18日，兴义军分区公开支持“三一九”派在兴义城中心的场坝上开大会，军分区的军人曹连贵等公开在大会上站出来为“三一九”说话。会场外有人向“三一九”的下午屯头头梁世德开枪，结果却击中曹连贵，致其当场死亡。凶手据说是地革委操纵的“107兵团”的人，但后来凶手并未查实，自然就没有抓获。地革委被李再含改组后保留下来的“三一九”派代表赖碧如（军分区某干部的妻子），多次到昆明找军内关系活动，告李再含的状。

1969年中共“九大”后，李再含受到中央批评的消息陆续传来贵州，兴义军分区张星炳支持的“三一九”势力更加膨胀起来，兴义地区各县“三一九”派活动频繁，与地革委在各县扶植的势力摩擦不断，三股势力明争暗斗的错综复杂的局面仍在继续。

### 蓝、张“支左”：造反派走向覆灭

1969年3月，在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会议上，周总理批评了李再含，李再含被迫释放了一些被关押的“四一一”成员。李再含组织的专业武斗组织“八一八”被迫撤销改换成“捍三红”。省工宣队被迫撤离兴义。“四一一兴义造司”闻风而起，又重新开始聚集。



（上图：“四一一兴义造司”三位主要负责人。）

3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发出《对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给贵州部队的指示》（时称“两个红五条”或“双红五条”）。4月8日、11日，兴义地革委开会为“四一一兴义造司”及其头头罗、王、林平反，

恢复他们在地革委的职务。不过，这时“造司”的骨干罗德芳，还有“造司”头头罗安义之父（兴义一中罗重民老师）以及不少“四一一造司”成员和受牵连的人，仍被关押着。直到中共“九大”闭幕后的5月，在安龙事件中被捕的“三一九”代表人物肖岐山、季善良获释。兴义地革委才同意释放二罗等“四一一兴义造司”方面人员。

逃亡在外的笔者也在此时回到贵州，在贵阳与赴筑活动的“四一一兴义造司”会合，一同返回兴义。这时“造司”组织了一个班子，为排除干扰，驻马岭镇，整理“四一一造司”的资料。当时贵阳师院毕业的“四一一”成员吕景新（兴义一中校友）参与了编写，吕景新是笔者母亲的学生，我们合作得很好。

在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大形势下，李再含势力大大削弱，贵州“四一一”得以复苏，“四一一兴义造司”也获得造反派彻底覆灭之前的第三次短暂的“解放”。

天真的造反派当时并不知道这是面临死亡前的“回光返照”，还兴致勃勃地开展了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等的排练、演出等活动……

后来的覆没来得太快，我们在马岭镇编辑印制的宝贵的兴义文革资料，也不知落到了何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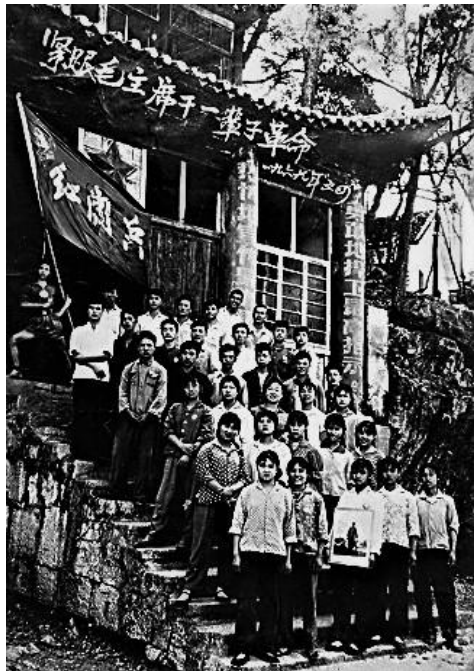
（上图：尚未得到正式平反的兴义造司在中央“双红五条”下达的喜庆气氛中召开了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于1969年3月28日合影。）

1969年10月26日，中央下发对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发[1969]71号文件）李再含留京检查学习，五十四军政委、昆明军区副政委蓝亦农，四十三军军长张荣森入黔主政，对各级革委实行“补台”。

在省城贵阳，“四一一”在各单位的组织都以“大联合”的名义解散，社会上的群众组织活动完全停止，镇压“四一一”的“三结合”领导干部仍然大权在握，各级革委会的“补台”中，真正的“四一一”代表基本无份，个别成为“补

台”代表的也只是摆设。在“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凡是参加两派武斗的，一律按“混入群众组织的坏人”或“五一六分子”处理。1971年的企业招工，“四一一”多数出身不好的学生几乎都被排除在外……

蓝、张军政府对兴义地区的“支左”更加“大刀阔斧”，否定群众造反运动



的态度十分明确，手段更显毒辣。因此，他们领导的兴义地革委等实行“补台”的整个过程，成为“三一九”势力（也是有“十七年”根基的各基层保守势力）的全面复辟或“回归”，同时也是对“造反有理”的彻底否定。“补台”的结果，是文革初期“造反有理”运动产生的“造反派”的彻底覆灭。

（左图：“四一一兴义造司红闯兵”部分成员1969年“五四”合影。）

1969年11月20日至1970年1月20日，贵州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贵州驻军支左领导小组，集中兴义地区和全省26个县的革委会成员、群众组织代表，军代表及个军分区负责人共1034人办学习班，批判李再含等人错误，解决派性矛盾等问题。

1969年11月25日至1970年1月20日，贵州各地州市和县及基层单位两派头头共2019人到北京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兴义“造司”罗安义等在内。

罗安义等参加这个中央“学习班”的原“四一一”派进入各级革委会的代表，离开“学习班”后悉数进入各级监狱。

## 1970年：造反派从组织上遭摧毁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展。

1970年1月5日，贵州省革委批转省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关于我省1970年人民防空工作意见》，第一步就是清查“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他们遣送回原籍。

2月10日，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城市中的几种人进行清查处理的通知》……

火药味越来越浓，而且与运动初期乃至“十七年”的各种运动一脉相承，打击的对象也大体一致，不过重点集中到了文革造反派身上。

兴义的罗安义等造反派头头被集中在北京的中央学习班时，蓝、张军政权便

煞有介事地搞起兴义地革委及各县革委的“补台”来。在他们主持下炮制出来的名为《彻底砸烂李再含的独立王国》的批判材料，主要内容完全是对兴义“四一一”造反派的声讨和清算，而且手法也与张星炳操纵的“三一九”一般无二，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蓝、张派到兴义的“支左部队”住在兴义湾塘河畔兴义地区招待所。

各单位又办起了与文革初期“牛棚”性质一样的“管训班”、“学习班”，兴义一中运动初期被整的老师高宝龙、周瑞琮、花瑞泉、毛光平、刘博文、蔡汝鼎等，再次“回笼”，罪名与文革初期“资反路线”整的完全一样，高宝龙还被加上了一条“为罗安义画军事地图”。

兴义地、县“五七干校”分别成为地、县两级“揪出来”的“四一一造司”派人员的集中营。被集中的人员平时监督劳动，必要时就按需要被各单位、各种大会拉去批斗。

针对“四一一兴义造司”的大抓捕，也扩大到倾向造反派观点的群众及曾经支持过造反派的外地学生。军管会还抓捕了观点倾向造反派的民主人士吴传召、吴希谷等，吴传召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五年……

“独山事件”自然成了“反革命事件”的典型。在“1970刑字第91号”判决书中，将陈才应、陈述应、陈王氏、陈朝典四人被判死刑；被判有期徒刑的有辛启华、陈龙应、陈洪应、陈仕应四人；被拉去批斗和审讯的有陈学应、陈明应、杨学珍、陈合应、陈金应、陈取应、陈福应、陈胜应、陈朝举、高珍等十多人，其中陈朝仲在批斗和审讯中被活活打死……针对独山“四清下台干部”陈家的迫害扩展到整个村子，全村的造反派和贫下中农无一幸免。

为达到彻底剿灭造反派的目的，对造反派挨户抄家之后，将七户陈家人赶出家门，摧毁他们世代耕耘、辛苦创建的家园，强行搬迁到其他地方：独山案件“首犯”陈才应家母子二人被捕被杀，仅剩的一个八十岁的老父亲和几个小孩子（最大的一个姑娘才十六岁）被赶到另一个村子，无家无业，只得在一个牛圈内安身。把陈家人赶出家园的同时，还往独山搬迁进另外一些地方的七户人家，实际是用这种方式监视、控制独山人，达到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独山村的目的。

但是，“四一一”人的抗争仍在继续。

1970年2月24日，“四一一兴义造司”的下午屯“七一六”兵团刘云志、周兴武、刘启华三个年轻的农民，而且刘云志出身雇农，周兴武、刘启华出身贫下中农，刘启华的父亲还是土改时入党的老党员，都是根红苗正。他们拿着写好为独山事件抗议的大标语，来到兴义城中心场坝附近的杨柳街。他们贴出“兴义要地震！”“火山要爆发！”……马上被巡逻的部队人员发现，他们也马上被带到湾塘河畔的地区招待所支左部队所在地，整整审问了一夜。第二天，公安局来人

把刘云志、周兴武铐了带走，然后部队派人把刘启华武装押送回下午屯。

押送的人员一走，刘启华立即通知各战斗队成员开会，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决定先到昆明，然后到北京告状，把兴义眼前形势，和支左部队抓造反派的做法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直到此时，大家还认为眼前的现实是有悖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和以往一样的一次“反复”！

于是，两个农民——刘启华和徐忠伦，两个干部——学校的黎由亭、仓库的梁××，一同前去告状。一行四人先到马岭，途经威舍、黄泥河、富村、富源、沾益，上火车到了昆明，沿途得到云南“八二三”造反派的帮助。到昆明军区交了材料后，又继续北上。到了北京，先找到中南海，然后到中央文革接待站递交了材料。

他们千里迢迢、千辛万苦，自以为向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告状，定会得到伸冤。谁知道四个人还没有回到兴义，那些浸透血泪的告状材料，已经被打回兴义，到了所控告的人手中，并成为他们的“罪证”。

下午屯刘氏庄园，当年大地主刘氏家族所在地，历来是进行阶级教育的基地。这时成了兴义军分区教导大队管训班的所在。这管训班由“三一九”民兵看管。

“三一九”头头梁式德、肖昌进、田洪顺等负责。里边关的，除了“一打三反”等运动中揪出的批斗对象外，都是“站错队”的贫下中农及其子弟。对他们使用的专政手段，却依然是当年“阶级教育”中展示和控诉过的反动阶级镇压贫下中农的那些残酷手段。

兴义地区各县无一例外，“四一一”造反派走向覆灭。

作为盘县“四一一”造反派代表进入县革委任常委的张光来这样回忆：

1970年2月，元宵刚过，春寒料峭。蓝、张一面把盘县两派（本为三派……——引者略）的头头和骨干召进在贵阳桐木岭的省学习班，一面通过支左部队的发动“受压派”（兴义军分区支持的“三一九势力”建立的盘县“四一四”革委——引者注）揭发、斗争掌权派即支红派（应为造反派——引者注）。黑监狱遍地开花。支红派（应为造反派——引者注）干部、党员、退伍军人水塘区革委主任李绍钦，被残酷揪斗、关押、毒打致死；“4·11”派干部、贫农、党员、鸡场坪革委主任杜登富，被残酷毒打、关押兼饥饿而死；就连一般群众也不放过，酒厂工人蒋文辉，解放前靠要饭、帮工为生，只因其女是“4·11”学生，被残酷毒打致死，他在两年前也是被这些人毒打致终生残废；乐民区医院张道洪，工人出生的支红派被残酷揪斗，当场毒打致死；盘县中学教师、“4·11”派、转业军人刘洪祥生病也不放过，被多次揪斗、毒打致死。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在“支左部队”（蓝、张——引者注）入城以后一年多时间，全县被打死、关死、

逼死的干部、群众将近百人。真是典型的法西斯专政。<sup>1</sup>

其时，全省一样，几乎每天都有人到省“学习班”抓人，每个县的每一个革委会中的造反派成员，都成了“待宰的羔羊”。这样的“学习班”的性质可想而知。

“学习班”结束时，盘县革委会主任李长春，副主任冯帮奎、周亨连，县委常委江文灿、朱燕萍、文自蒸、叶叔先全部进了监狱。常委张光来后来也未幸免。其余县革委委员罗昌明、曾大鲁、刘汉全、谢文端、彭希连、王友太、钟明珊、赵家政等，也无一幸免。从此，造反派彻底坠入苦难深渊。

据《盘县特区志》记载：“（1971年）六月上旬，开始在全特区范围内开展清查‘5·16’反革命运动。”造反派的头头们，包括“支红派”和“四一一派”，无一例外地由原先的“坏头头”等罪名升级为“‘5·16’反革命分子”，遭到更为残酷的迫害、镇压。“5·16反革命分子”、“5·16反革命集团”、“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策划者”……罪名信手拈来。造反派被以这些罪名的抓捕的数字，6月份68人，7月份升至135人<sup>2</sup>……

整个兴义地区血雨腥风。兴义“四一一造司”头头全部被抓并被判刑：罗安义（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先判死刑，后改判20年有期徒刑，苏祖华被判12年……贞丰马文华（六六届高中毕业生）被判七年……

继1970年“一打三反”的大抓捕之后，当年云集于“造反有理”大旗下的造反派及其社会基础（即“造司”观点的干部、群众）都遭到了“秋后算账”：地、县两级干部进“五七干校”变相劳改，随时准备接受批判；属于下面乡镇的，进支左部队在下午屯的教导大队主营和下午屯民兵（原“卫红司令部”）管理的管训班；城镇居民疏散下放的“战略部署”，也成了打击造反派的一个重要手段：既然兴义城内绝大多数的市民都属于“四一一造司”观点，疏散下放名单也就从这些人中选择拟定……

笔者从北京被押送回到兴义关在派出所的时候，就听送饭的一位民兵小伙子说：疏散下放到他们那里的一个原来我们“红闯兵”的小姑娘刘小嫚，拉着板板车到城里来拉粪肥。小嫚是个很文秀的小姑娘，当时也只有十多岁，应该是读书学习的年龄，作为“疏散下放”的贱民，被迫担起生活的重担，身心俱遭摧残。这样的人生悲剧却被披上什么“改造”、“锻炼”、“新生事物”的美好外衣。

当年“四一一兴义造司”红卫兵陈祖吉回忆：

1970年初，支左部队进驻贵州省，兴义地区八县（兴义、兴仁、贞丰、晴隆、

<sup>1</sup> 张光来《载沉载浮》。

<sup>2</sup> 同上。

普安、望谟、册亨）都由营长或连长带兵进驻县城。接着，各县相继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简称“知青办”），由当时的县革委副主任兼任“知青办”主任。

1970年春节后，兴义地区各县组织“老三届”中学生集中学习，由“支左”部队干部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三个月集中学习后，由“知青办”组织，“支左”部队协助具体安排“老三届”中学生的上山下乡事宜。在分配插队落户人员时，带有明显的派性色彩。文革中原兴义“三一九派”的中学生根本没下乡，而是安排在事业单位工作（如医院、各级党政部门）。将文革中原“四一一派”的中学生，全部安插到边远的农村。有的距县城有二百多公里。并将其中有些产生怨言的中学生户口强行从派出所注销，强制性赶下农村。

此时，已进入革委的兴义一中老三届学生罗安义已判20年徒刑，苏祖华已判十二年徒刑，贞丰县中学马文华已判七年徒刑……

对于造反派“四一一”的老三届中学生来说，所谓“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成为十足的政治迫害，只不过区别于抓捕、关押、判刑，而形同流放。

面对这种打着红旗的政治迫害，以兴义二中“四一一”派学生张有富（张老毛）为首的知青，组织了“兴义地区八县知青联络站”，到地革委提出两点要求：

- 一、要求无条件释放兴义及各县老三届学生罗安义等；
- 二、解决知青的生活安排和工作问题。

此时的兴义地区，蓝、张及其后任的“支左”军人，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态度鲜明，把“四一一”造反派视若寇仇的张星炳大权在握，对这些政治迫害的对象的要求，态度可想而知！

桥归桥，路归路。蓝、张“支左”，对兴义地区及各县的“补台”结果，使“三一九”为代表的“十七年左派”势力，对他们在文革群众造反运动中短暂地失去的一切，都连本带利地回到他们手中。尘埃落定，他们开始疯狂地秋后算账：杀戮、抓捕、流放……

对于曾经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造反派来说，和当初造反时刚好相反：当时越是低层，造反的精神越是强烈；而到了这时，越是低层，受骗的感觉越是强烈。于是后来的人谈起文革，“受蒙蔽”、“受骗上当”论成了回顾历史时认识的主流。



## 八县知青大抗争：兴义文革的余波

对于后来发生的一切，从1971年的“九一三林彪事件”，到1976年的“粉碎‘四人帮’”，都又成了“天上人在打仗”，无论批判也好，欢呼也好，人们内心都是另一种感觉了。

1972年9月，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同意〈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的通知》（中发[1972]38号文件），蓝亦农、张荣森被认定为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和宗派主义错误。中央另派鲁瑞林、郭超率工作组到贵州“帮助工作”。

1973年5月17日，中共贵州省委、省革委、省军区发出贯彻军委通知，“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中共中央派李葆华到贵州工作。

尽管蓝、张下台，革委会调换人马，造反派地位依旧。兴义这块天，是再也不会变的。

1973年，兴义地区贞丰县武装部科长王廷军利用权势强奸了知青小刘，使矛盾激化，引起广泛的公愤。知青代表带着怀孕三个月的受害者女知青小刘到北京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安部反映。最后结果，仅以安排受害者的工作了事，对兴义部队和地区当局对待知青的态度和知青的处境等根本问题，完全不予理睬。

矛盾不解决就会继续发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4年6月9日傍晚，兴义电影院门前发生了公安民警执勤时开枪打死贵阳到兴义鲁屯插队落户的知青杨兴祥事件。面对人命关天的严重事件，兴义公安局却将打死无辜知青称为“误击毙”，不仅不承认错误，承担后果，反说受害者“该死”。

兴义地区以张有富、戴晔、吴华林、王永石、周垒为代表的八县知青，乘坐群众支援的大客车、货车各一部，搭载杨兴祥尸体到贵阳申诉。

知青队伍途经安顺七眼桥时，被兴义地革委副主任李明带百名武装警察拦截。幸而得到安顺“四一一”造反派余中均带几百造反派支援，才使得兴义地革委的拦截未成。愤怒的群众把指挥拦截的兴义地革委副主任李明及其小车一同带走，一直护送兴义知青到达贵阳。

兴义上访知青带着冤死知青杨兴祥的尸体到省城贵阳大十字街头，贴出“严惩枪杀兴义知青杨兴祥的凶手”、“强烈要求省革委伸张正义认真解决兴义八县知青问题”、“无罪释放罗安义”等大标语和《兴义八县知青到贵阳上访的原因和要求》的大字报。贵阳广大群众纷纷支持，主动给受难者家属捐款。

但贵州的当权者却一方面敷衍推诿，一方面仍然是老办法：行使镇压之权！

知青代表张有富被以“危害社会公共治安”罪逮捕，判刑三年（张有富案件至今没有依法解决）。

兴义地区知青这一系列斗争，是兴义地区造反派红卫兵被以“知青”的名义流放到边远地区并继续受到迫害以来，为争取起码的生存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但这只是兴义文革的余波。

此时不仅是兴义地区的文革群众造反运动，已被完全镇压，烟消云散，就是省城贵阳地区的文革，实际上的群众运动也不复存在；所以，当兴义地区造反派知青抬着来自贵阳的知青尸体，到贵阳大十字抗议和请愿的时候，贵阳“四一一”竟没有任何态度——当时的贵阳“四一一”已没有组织上的存在。

## 写在后面的话

文化大革命被称为“十年浩劫”或“十年动乱”，是以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作为文革的结束来计算的。就兴义地区而言，从1970年蓝、张军政府主政时的“秋后算账”开始，以1970年5月的“兴义地区补台大会”为标志，整个“四一一兴义造司”被全部镇压，以“造反有理”为旗帜的群众造反组织彻底覆灭，文化大革命的群众造反运动就结束了。

当年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追求自身的解放“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造反派，或丧命于文革中“新生红色政权”的屠杀，或死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刑场。

随着李再含的倒台，蓝、张主政，军政府掌权，他们的主要业绩有：

“大联合”——实为解散群众组织，取消群众运动；

各级革委会“补台”——实为打击、否定造反派，“补台”中真正的“四一一”群众代表，绝大多数没有补进各级革委会；

全省开展“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实为对造反派的“秋后算账”。

蓝、张“军政府”在贵州全省的主政方针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是，兴义地区根本没有也完全用不着“大联合”的过程（或步骤）：兴义的造反派此时杀的杀、抓的抓、关的关，完全被镇压下去了，参加“大联合”的身份、资格都没有了。这也说明所谓“大联合”，不过是解散群众组织、取消群众运动的手段。

至于“补台”，在贵阳地区要显示“一碗水端平”的情况下，尚且“补台中四一一真正群众代表，绝大多数未补进各级革委”<sup>1</sup>，在“四一一兴义造司”被完全镇压的情况下，兴义地区已无“一碗水”可“端平”，兴义地区的“补台”，便成了对“四一一兴义造司”的彻底清算：一本《彻底砸烂李再含的独立王国——兴义地区革命委员会补台代表大会揭发、批判材料汇编》，充斥了对造反派的

---

<sup>1</sup> 邓振新《贵州风云》。

口诛笔伐：指着“李再含”的名字，骂的是罗安义及其代表的“四一一”造反派！<sup>1</sup>

历史证明，省城的“四一一”造反派的命运并不比兴义“四一一”造反派结局好。后来的“批林批孔”、“批邓、反右”等各式各样的运动，一直到后来的“揭、批、查”，无论是鲁瑞林、李葆华、马力，哪一个上台，贵州“四一一”造反派，连同“支红派”的造反派，无论是头头，还是骨干，进革委会还是没进革委会，后来的结局，都少不了进各种各样的“学习班”，被以形形色色的罪名关押，乃至判刑。兴义“四一一”造反派的覆灭，不过是先走了一步而已！

世事沧桑，斗转星移。几十年过去了，文革并没有因为“彻底否定”而被轻易地一笔勾销，至少它始终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在否定了“浩劫”、“动乱”之后，应该还有一些无法否定、不应否定的东西，需要人们去探讨、总结、反思。

2019年3月13日补订

---

【生逢乱世】

## 我的文革岁月

周一筑

### 我和文革

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了五十年，整整半个世纪。尽管中国上上下下都有人出于各种原因，总是在对它重新评说或重新“定义”，无论是“十年浩劫”，还是“艰辛探索”，总想用简单的抽象的概念来取代那段空前复杂的历史，甚至总想让过来人忘却，总想把它从中国历史上删除，从个人以至大众的记忆中抹掉。

但是，无论是“十年浩劫”还是“全民疯狂”，也无论是“彻底否定”还是“艰辛探索”，无论是执政党及其掌控的国家政权，还是经历过文革的每一个人，只要涉及到当代中国的历史，涉及到从那些年代走过来的这一两代人的经历，这场文化大革命都是无法回避的、迈不过去的一道坎。而且，历时愈久，这该死的文革就愈是显得不可磨灭，越来越配得上它当初号称的“史无前例”！

---

<sup>1</sup> 见《彻底砸烂李再含的独立王国——兴义地区革命委员会补台代表大会揭发、批判材料汇编》影印资料。

文革前夕的1965年，我从母亲任教、我自小在那里长大的兴义一中高中毕业，因“血统”问题高考落榜。

我这样说，并非主观臆断，或为自己没考上大学找借口。当时不仅高考，各级各类学校录取新生，都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这是人所尽知、再正常不过的事！当时我校两个应届高中毕业班同学中，虽成绩优良却有“血统”问题者，无一例外地无缘进入高校的大门。

当时恰逢贵州省交通厅修筑盘县煤矿特区公路，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便报名当了一个修路合同工。

于是，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我只能在筑路工地工区部的大喇叭中听到，而没能亲身领受运动初期批“三家村”、批“黑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那些风风雨雨。

直到1966年国庆之后，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我从母亲的来信中知道了一些让我担忧的情况。刚好一年合同期满，我便回到兴义，回到母亲身边。

形势的变化让我大开眼界。以后的一切都身不由己而又势在必然，当初怎能预料，我热情投入的这场“史无前例”会有怎样的真实内容和经历怎样曲折复杂的过程？

## 短暂的“解放” 与回归“十七年”

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轰然袭来时，我的母校兴义一中成为兴义文革的重点，我的母亲则成了兴义一中教师中要打击的重要对象，历经种种磨难。当时还在筑路工地上的我，对这一切竟毫不知情！至今想到母亲在这一时期独自经受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种种折磨，更觉得悲痛难忍……

在兴义文革“横扫牛鬼蛇神”阶段，母亲身陷黑监狱，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那时我尚在盘县的深山里修特区公路。我每天只能从工区部的大喇叭里听到工农兵批判“三家村”、批“反动学术权威”等等信息，不知一场空前的风暴正裹挟着无数冤魂在神州大地上肆虐……

直到一天接到了母亲一封十分特别的信，信里除了措辞含糊的语言，还有一份母亲的自传。经过推测和联想，可以知道母亲已身陷这场“史无前例”的“横扫”风暴之中……

我因此病倒两天，想到母亲寄来的那份“自传”，当时还不明其义，以后才知道：母亲是在用她自己亲笔书写的自传，向我揭穿那些运动中编造的关于她历史的罪名！

母亲在1952年从“革大”（西南革命大学贵阳分校）毕业分配到兴义教书之前，从未任过一天公职，也根本没有加入过国民党，文革工作组却给她的编造了国民党“县党部代理书记”的罪名！

后来知道，母亲得到学生们广泛的尊敬和爱戴，竟成为她“和党争夺下一代”的罪名；而学生们历年来给自己尊敬的老师写的信件和赠送的照片，也都统统成为把老师打入地狱的“罪证”！

正好修筑公路的一年合同期满，1966年11月，我回到兴义时，已过了运动初期工作组的“资产阶级专政”时期。当时的兴义，已经开始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革的发动者、伟大领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有关讲话与文件，一扫工作组时期的“白色恐怖”，到处涌动着“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和“造反有理”浪潮。

兴义一中工作组和文革小组基本不管事了，母亲和其他挨整的老师也都得到一时的“解放”。在母女相见的喜悦之后，我隐约感到母亲有对我毅然离开公路回家的忧虑。我由此觉出，从来就对伟大领袖无限信仰无限热爱的母亲，内心深处对前景尤其对我存在的隐忧。

年仅二十岁的我，却并没有想这么多，很快就和大家一起投入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

这时南下串联的学生和省城贵阳来的高校红卫兵，在兴义开展了各种活动：贴标语、大字报“揭开兴义的盖子”，呼吁为被各单位文革小组、工作组整成的各种“反革命”平反。我一边和同学串联，交流信息和思想，酝酿成立组织，一边和母亲参加各种群众集会，“炮轰地、县委”，找当权派、工作组要求平反……和大家一起，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身心解放、平等和自由！

这时的整个社会，弥漫着平等、自由、民主的空气，特别是长期受到压抑的人们脸上洋溢着希望的阳光。这是后来的人，以及许多未曾有过文革亲身体验的文革研究者所难于体会的。

我和高中同班同学、也去盘县特区当过筑路合同工的王清亚，兴义一中高中66届毕业生周建华等，每天都收集到各种传单，最让我们心灵震撼的是遇罗克的《出身论》。出身、血统，这种与生俱来就压在多少人头上的大山，主宰多少人一生命运的问题，由这个和我们一样的同代人提出，在当时无异于石破天惊！

只可惜，当年的遇罗克这些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很快被监禁，甚至遭到屠杀。

当时社会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各个单位、各种行业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我们几个兴义一中的校友酝酿组织战斗队，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决定取名“红闯兵”。其中的成员，除了我和王清亚及其他几个已经离开学校一年的同学之外，还有一些在校生。

我们从看大字报，到书写、张贴大字报；从收集传单，到自己刻印、散发传单……然而更多的是聚集在一起思考、交流、有时争论问题，比如说关于“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其中一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就牵扯到对十七年来我们所知道或经历的许多事情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在这样的思考与讨论中，从大字报、油印小报、传单上传播的信息，介绍的新思想，联系到十七年的种种政治运动，以及文革初期刚刚发生过的血淋淋的现实，个人的命运、大众的期待、国家的前景……这许许多多、不同层次的东西交织到一起；我们的思想在碰撞，心灵在激荡，感到灵魂都似乎在升华……

这些当年让我们打通思想、开阔思路、触及灵魂的问题，和当前运动联系在一起，都成为驱动我们投身到群众造反运动的动因。

但是同时我们看到，在这些问题面前，出现了另一批人。他们从一开始就态度鲜明地维护着我们反对的一切，诸如他们要保卫人们“炮轰”的地、县委，阻挠给运动初期的受害者平反，反对人们对文革领导小组、工作组的批判等等。

这种思想观点的对立，开始时以辩论的形式展开，辩论在学校、单位和街道都经常都发生。在兴义城中心场坝上大字报栏前展开的群众性辩论，更有代表性，这种辩论极大地开拓了我们的视野，鼓舞了我们的斗志。

王清亚是我高中同班同学（小学也同过班），应该是很熟悉的；但自从一起组织“红闯兵”，他忽然让人看到了他原本默默不语所掩盖的活跃的思想，以及活动和组织能力。外号“小公鸡”的周建华思想敏捷，经常喜形于色、义形于色，经常是城中心场坝上辩论中驳得对方难以招架的雄辩之才。

我的工作主要是写大字报。我们基本没有什么经费，忘了我们的一个油印机是哪个组织捐献的了。那些大字报的笔墨、纸张，是小窦（窦兴民）他们到处去张罗来的。我们“红闯兵”的大字报还是很有分量的，开始是以“红闯兵‘秋风劲’”的名字张贴（这个名字还是最近有人记起，我听说了才回忆起的），后来周建华回一中参加到“经风雨”的活动中，我的大字报稿就通过他，以“经风雨评论员”的名义抄出张贴，其中一份揭批“谭（立夫）氏路线”的大字报曾遭“三一九”猛烈攻击，后来在蓝、张主政时对造反派秋后算账，还对此文大加鞭挞，并在“揭批材料”中有记载，只不过把罪名安在了“经风雨”头上。

而对立面最出名的是一中六六届高中生潘复生。这个公检法的后代，因在同学中年纪大、个子大，人称“大老潘”，是“保皇”“红卫兵”的头。关于“大老潘”，当时学生中还传开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民谣：“大老潘，三十三，胡子拖齐脚弯弯……”

除大老潘外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个叫刘琦的，也是一中的学生，当时就有人介绍：这个刘琦是四分监某某当官的儿子。此人也喜好参加辩论，经常是“小公鸡”周建华的手下败将。

这样的站队情况各系统、各单位都基本一样。“革”与“保”，“造反派”与“保皇派”的战线就这样拉开了，观点明确，阵线分明，还真有点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味道。

应该说“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此时得到充分的运用，尤具“中国特色”，我们这类长期受到血统论压抑的人，当时所体会到的那种身心解放所激起的热情，比起自幼便接受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等等无比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更加具体和贴切。

然而，这场“史无前例”的群众造反运动才刚刚掀起高潮，在“造反有理”旗帜下扬眉吐气的“阿Q”和“闰土”们的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

兴义军分区介入“支左”后，用一个由军分区政委张星炳炮制的“三一九夺权”，一点新意都没有地又把兴义地区带回到了十七年来的政治格局，又重演了一遍文革初期工作组“资反路线”时期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那一整套做法。

“三一九夺权”的过程里，造反派组织“兴义革命造反司令部”及其各单位的头头被抓，组织被取缔，人员遭批斗……

每天，军分区的高音喇叭杀气腾腾的“揪出……批判……镇压……”等喊声不绝于耳。此时，我和“红闯兵”的几个同学，尚未遭到明显的镇压——可能一时还顾不上我们，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无疑又笼罩在黑暗之中。

我们顾不上为自己的前途忧虑，却是不由得重新审视我们造反初期的思想，于是，我们又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带来的思考，再思考了一遍……

混乱、矛盾、迷茫……大概是一种不认输的情绪的主宰吧，似乎内心并不悲观。

位于城中心的李老碧（一个女生的小名）家，是我们经常聚集的地方，因为那里是人员、信息集散地。

王清亚所住的地区农业局他哥哥家，也是我们那一段时间经常去的地方。我们聚在这里，有思想的交流，更有相互的鼓舞和慰藉。

一天，我忽然在邮政局看到一张小报，上面说：一股由上至下的反动的“二月逆流”，对全国的造反派进行疯狂的镇压。

于是，一切似乎又得到解释：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扑！

年轻的心，又充实起来。我们迫不及待地把这个信息传播出去，同时从省城和外地传来的各种消息也证实了“二月逆流”对文革的对抗。

我们在一起讨论：既然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应该把兴义文革的情况，把兴义军分区张星炳通过“二月逆流”制造白色恐怖，对兴义造反派实行镇压的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

### 第一次爬火车进京告状

1967年的4月，兴义还在军分区张星炳掌控的“三一九”政权的白色恐怖之中，我们决定到北京告状。

我和王清亚、“小公鸡”周建华、小名“罗老二”的罗瑞玖，加上李老碧、罗老祥（都是小名）两个初中的小女生，一共六个同学决定北上。两男四女，大多没有路费。母亲无一例外地支持我的一切行动，这次又把我修公路时寄回家的几十块钱工资给了我。

六个人肯定不够买车票的钱。从兴义到贵阳可以托熟人找货车，搭车去。到了贵阳火车站，先用两三块钱买张票上了车再说。

我们混车一直坐到即将进入广西的麻尾，便被发现后赶进了餐车内。一番盘问后，以我们无票坐车，而此时已停止大串联的理由，让我们下车。

应该说列车上盘问我们的态度，以及让我们下车的理由，都无可挑剔的，态度也算客气，但我们肯定不能就范，于是就和他们软磨硬缠，坚决不下车。

一直磨到和广西交界的一个小站，列车员才强行把我们四个赶下车，同时又把李老碧、罗老祥两个小女生硬交到回贵州的列车上，强制她们回贵州。之所以区别对待，应该是见她们俩年纪较小，出于安全考虑。

我们四人被赶下车后一打听，此处是小站，快车是不停的（我们被赶下的是慢车），我们要想重新爬车（混上车）继续北上，就只有步行到前面的大站。没有选择，我们只有打起精神，沿铁路步行到前面大站再说。

天黑前总算赶到前面大站，老天眷顾，还真有一趟北上的快车经过！

我们分成两伙（好在身边没有行李）：我和罗老二两个女生边吃着刚才在站台路边买的水果（装成从车上下来买水果的乘客），边上车。车厢门口的乘务员还和我们搭话，王清亚他们两个男生也想法混上了列车。一路顺利，我们坐到了柳州。

柳州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当天已无北上的车次，继续前行，我们只能重新打主意。



柳州是我们几个人都从未到过的异乡。就在这陌生的土地上，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天下造反派是一家”的深厚“革命情谊”。

我们住进了一个旅馆，接待我们的服务人员一见我们几个学生模样的外乡人，眼中就现出平和的目光，也没让我们登记，便把我们带到一间屋子里，我们只说是学生，对方就直截了当地问：你们是老保、还是老造？

我们立即回答：老造！

一声“老造”，对方脸上就露出亲人的笑容。一句话都不用多说了，“一家人”的感觉是不需要多余的语言的！

此情此景，我至今难忘。特别是在人欲横流、人与人的关系即使是血亲都只能用钱、权相连的当下，一想到当年的那些经历，我的心就难以平静……

随后就来了几个人，应该都是旅馆工作人员中的造反派，领我们去到几个旅馆角落的床位安顿好，当然没有收我们的住宿费。

到了吃饭的时候，又来人把我们带到一个房间，摆上饭菜招待我们，我还记得吃的有空心菜。

知道我们是受“二月逆流”镇压、现在要到北京告状后，便指点我们到某处去找学校的红卫兵帮忙。我们能感觉得到，他们也正处在“二月逆流”的阴影之下，处境艰难，但仍在斗争。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按照指点，找到那所学校。在一间教室里，一个老师模样的人和十几个学生正在开会。了解我们的来意以后，他们就把我们带到火车站的货车站。

经他们的指点和介绍后，我们知道了对北上的货车的标志和发车时间怎样识别，我们可以爬上这些北上的货车，最终到达目的地了。

货车站里也不时有铁路工人出现，但对于学生模样的我们，他们并不理会，更不干涉，他们已经见惯不惊了。

从这里，我们真正的“爬车”旅行开始了。只要是往北的列车就上，但车在哪里到站就不知道了——反正见车就上，到站就下，下来又上，一路往北……

一般北上的车倒容易区分，但发车时间就不容易搞清了。开始我们上车去等，等的时候要悄无声息，时常有工人上来查，一般对学生是睁只眼、闭只眼；但也有闲杂人来爬车，被工人遇到往往就不那么客气了：下去下去！你们也要串联？你们也是红卫兵吗？

好家伙，想不到我们在这里还沾了“红卫兵”的光！他们也不查查我们这些人的家庭成份？

一开始我们是先埋伏在北上的货车车厢里，一声不响的，只要列车一开动，大家就在车厢里跳起来，高兴地大声欢呼！到这时我们才发现：岂止我们，岂止我们所在的车厢，我们前后好多节车厢里都有和我们一样的爬车族。

后来我们胆子大了起来，耐不住躲在车厢里等车开，便站在往北的车厢外观察，哪一列车厢一动，立马跳上去……

记得列车到达桂林是在夜间。大家身体疲乏，精神放松，就打算找个地方歇息歇息。我们摸夜路不辨方向地往前走，并不知身在何处。忽然，晨曦中前面的一处景物让大家眼前一亮：这不是象鼻山么？

果然是象鼻山啊！那这里就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了——幸得我们还读过几天书！

一阵欣喜，便决定稍作逗留，也欣赏一下这“美甲天下”的桂林景色。

走出血雨腥风的人间，步入美景如画的大自然，难免有一点迷离恍惚之感。

王清亚跃入漓江之水，游向江中，不想上岸……

我和罗老二则更是被芦笛岩中的溶洞奇观所陶醉。

我们还一起混入桂林师范学院内，爬上了独秀峰，将山下美景尽收眼底……

当然，使命在身，不容我们留连忘返。我们很快便告别了桂林山水，继续北上。

就这样一直往北，眼见得北京近了。车到丰台站，就听见外面的大喇叭发出悦耳的喊声：

“革命的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列车已经到站了，车站已经为你们准备了开水，你们下车往左边……，往右边……”

大家很快明白过来，让我们在这里下车，目的是拦住我们，不让进北京城！看来像我们一样，用这个途径上北京的人还真不少。

大喇叭亲切动人地喊了半天，却没有一个人上当。于是下面的喊声就变了，变成宣布中央文革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然后让大家下车，返回原地。当然，声音也不如先前那样悦耳动听。

仍然无一人响应。

第三步，来人上车动员。上来的都是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许多一看便知是些入伍不久的新兵。车上这些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真假“红卫兵”们，自然不吃这一套，有的还跟年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战士开玩笑，当兵的一靠近身边就先发制人地大喊：解放军不兴打人啊！

于是，拦截的结果可想而知。我们终于进了北京城。

## 初次上访对京城的美好印象

北京！当时我们心目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圣地”，伟大领袖多次检阅全国红卫兵、掀起“造反有理”群众运动高潮的北京！我们终于来了……后人很难理解我们当时的那种激动心情。

进城后迫不及待地找到了中山公园内的中央文革接待站。的确，从全国各地来北京告状的人不少，亏得接待站的工作人员也不少，全是军人，一看便知是军官，而且从年纪看，职位应该较高。

我们递交了反映贵州兴义问题的材料，并叙述了兴义军分区张星炳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镇压群众运动的各种罪行。接待人员态度亲切，仔细倾听，并鼓励我们回去继续和“二月逆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这使我们感到一股造反派的情感暖上心头……

从接待站出来，我们觉得多日的艰苦辛劳总算没有白费，压在身上的石头去掉了，感到一身的轻松，满心的喜悦！

更令人惊喜的是，我们从接待室出来，便奇迹般地遇到了在麻尾被迫分离的李老碧、



罗老祥两位女同学！她们真不简单，居然被送回贵阳后，又返回北上征途，也千辛万苦来到了北京。

我们一起到了天安门。（前排左王清亚、右周建华；后排左起罗老祥、李老碧、周一筑、罗瑞玟。说明：“罗老祥、李老碧”均为小名。）

天安门广场：这里有历史，这里也有现实。面对这一切，我们感到自己是幸福的。当年的留影，把这幸福，真实地保留了下来。

接下来的时间，按照接待人员给我们的地址，我们找到接待站住下。当时全国大串联虽已明令停止，但北京还是保留了几个接待站，接待的对象主要是各地“二月逆流”打跑出来的学生。真想不到我们还享受了一番红卫兵大串联的待遇。

接待站都设在各种单位里面，我们只消象征性地登个记，就能免费在食堂吃饭，住宿当然也免费。

每天早上起来，早餐后我们就在食堂领上一挎包或是一网兜馒头，有时还可领上几个鸡蛋（他们叫“鸡子儿”——“子”读儿化音），然后就满北京城里逛——但我们可不是瞎逛，逛街的目的主要是看大字报。

时逢阳春三月，可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老天可不管人间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也不管你资产阶级或是无产阶级，照样地春光明媚、春花诱人：北京街头，尤其是王府井街口的马缨花开得红殷殷的，更有那阵阵花香，沁人心脾……

文革中我曾三次到北京，这第一次，是唯一给我留下美好回忆的一次，而这吸入肺腑便使人身心舒畅的马缨花的清香，便成了我记忆中的美好回味。

我们到王府井当然不是逛街和购物，是找大字报看。似乎人多的地方都有大字报栏。

因为大串联已经结束，在周围的北京人眼中，我们几个外地模样的孩子十分扎眼，有人问我们从哪来？我们说：贵州。对方便理所当然地说：哦，云南贵州。起初我们还申辩：贵州就是贵州，不是云南的贵州！后来也就懒得多讲了，免得还要跟他们解释贵州人并非打赤脚，而同样是穿鞋的。

北京人觉得我们的奇特之处还不是地域穿戴方面的差别，而是我们看大字报的异样表现。我们一边看，还情不自禁地相互交谈，有时甚至情感溢于言表，加上他们又听不懂，便向我们投来疑惑的、然而却是善意的目光。

可能是走出了白色恐怖，又接触到一些崭新思想和新鲜信息的缘故，我们往往按捺不住内心的种种感情，又引发出对一些问题的讨论。王清亚和周建华甚至还边走边争论，有时双方都争论得面红耳赤，弄得过路人还以为他们在争吵，便投来奇异的目光。

对于问题的讨论，一般在王清亚和周建华加上我三个人中展开。我肯定不会和他们两个男生在大街上辩论。无论是两种意见或是三种意见，辩论都在相互启迪中进行，因此这一时期，我们都共同感觉到正在扣开真理之门。

现在回想起来，尽管当时我们涉及的问题范围有限，深度更有限；而且，当时年轻的心并没有设想到，这扇门竟然是这般的沉重！对于我们来说，竟会如去扣地狱之门般令人胆寒。果真是“真理的入口处，正如在地狱的入口处”啊。

我们去了北大、清华。不是为了欣赏燕园的风景，也不是为了去领略未名湖的风雨沧桑，更不是为了去瞻仰清华园巍峨的牌楼。我们去北大是因为那里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而清华是蒯大富和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发源地，也即是造反派的发源地。

我们在北大、清华主要的收获还是看大字报。不过当时的感觉是，这两处对文化革命有特殊意义的学府，与外面相比显得略微冷清，大字报也不如大街上的多。（右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留影，左起罗瑞玟、周一筑。）

每个接待站的接待，是有时间限制的。为了多呆些日子，我们换了很多个接待站；同样，为了不让我们在北京待得太久，又往往把接待站安排在尽量离北京城远的地方。这样一来，对我们进城看大字报等等，就很不方便了。而且因为进城远，坐公交车，车票就贵，对于我们这些囊中羞涩的穷学生来说，每一分钱都是要节俭的。于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早出晚归，步行来回。



住得最远的一处接待站，是左家庄接待站。因为太远，来回步行时间就不够了。记得好像单边车票就是三角钱。一次上车，售票员到了周建华面前，只见他老实地拿出七分钱买票，而且告诉售票员，自己只有这些钱了。

谁知售票员向全车的乘客表扬了他哪怕钱少也主动买票的行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于是，车上很多人都争相为他买票。

当时的情境的确感人；因为这是文化革命的时候，“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正紧哦。

我想车上发生的这一幕是人性最正常、最自然不过的表现，这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泯灭的吧。

可是我们在左家庄，就遇到了最不正常一幕，听到了最不正常的故事。

左家庄当时有许多高楼，一座连着一座，很大一片，也不知道以前是干什么用的，当时是用来做接待站。里边接待的是全国各地来北京告状的，大多是学生。

一天夜里，我们刚睡下，就听见外面闹哄哄的。从窗户往外一看，只见一伙人呼叫着，气势汹汹地追过来，往前边一栋楼而去。

接下来发生的事看不见了，我们内心疑惑着，分明感到一种恐怖的气氛。有些人下楼站到路边，议论着。后来才听说是联动的出来抓人，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去抓哪一个地方的学生。北京的联动我们是知道的，但想不到他们这时还如此嚣张。

和我们住一栋楼的，有几个新疆建设兵团的兵团战士。知道他们是从新疆来的，我便想起那首《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歌：

人人都说江南好，  
我说边疆赛江南。  
林带千百里，万古荒原变良田；  
晚霞映湖水，雪山倒影映蓝天；  
黄昏烟波里，战士归来鱼满船……

这首歌旋律优美，所描绘的边疆景色迷人，令人神往，我们都很熟悉。

我们开始饶有兴味地询问面前的这几位边疆兵团战士，打算印证一下歌中描绘的生活。

他们马上露出尴尬的神情，继而脸上表现出难言的痛苦。

毕竟是年轻人之间，而且他们似乎也不想隐瞒，便对我们描述了他们的兵团生活。

他们在兵团的工作是给从天山引下来的雪山水挖水渠。

工作的艰苦劳累他们没有说，只说了他们住的和吃的。

他们住的是地下挖出的地窝子，黑暗、潮湿，不用他们细说，我们能想象出是个什么样子。

吃的呢，玉米（包谷）、玉米粥、玉米窝窝头。重要的是吃不饱。

老鼠与他们——光荣的兵团战士为伍，和他们争抢食物。一只老鼠一下子掉进一盆玉米粥里，把老鼠丢出去，粥是要继续吃的……

我观察他们的表情，说到这一切，他们十分平静。但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他们内心的沉重。

于是，歌中描绘的情境，我们根本没心情去向他们了解了。

几十年后，雪山之水仍然流淌。无论边疆是否赛过江南，我想，其代价不应该是用一代、甚至是几代人居住地窝子、和老鼠争食的青春奉献来换取吧？

文化大革命揭出的矛盾，已恐怕非发动者所能预料。难怪当时到北京告状的人如此众多。后来我们才思索：这些问题，是发动者以及他所发动的文革打算解决的吗？

我有个舅舅一家都在北京。我早听母亲说过，可我从未见过。终于有时间带着同学们去舅舅家看看了，舅舅是个老工人，舅妈完全是北方农村妇女模样。表妹玉兰当时初中毕业，当时自然无法升学，尚在家中。

舅舅家住在安定门内一个胡同里的小小院落里。舅舅老实巴交，舅妈和表妹对我们十分热情。老实的舅舅告诉我们：有富住北京的，也有穷住北京的。

穷住北京的舅舅和表妹一起，带我们这些第一次进京的南方娃娃去逛北海公园。有舅舅这个穷住京城的老北京带，我们到北海公园就可以不用坐公交，而是抄近路、穿胡同。于是这“穿胡同”也成了我们这次进京的一个收获。

当年的北海公园游人不多，显得冷清。当早就熟悉的白塔出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又在荡漾……此情此境使我浮想联翩：当年那些“祖国的花朵”们应该和我们差不多的年龄，如今他们在何方？是老保、还是老造？他们也会遭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吗？

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使命。此次进京收获是多方面的；南下回家乡时，面向未知的未来，我们却是内心充实、信心满满。

为了更多了解全国文革的情况，我们选择了另外一条回去的路线：经武汉、长沙回贵州。

时值伟大领袖对“二月逆流”提出批判，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已经下达，全国的文革运动又是一个新的反复。

我们到达武汉时，明媚阳光洒满大街小巷，人们的脸上现出笑容，街头，买甜瓜小贩的叫卖声都使人感到祥和。

在长沙，造反派也在翻起来。长沙的一夜，我们感到整个城市都在沸腾，人们在奔走、汇集；我们作为旁观者，根本不知正在发生什么，只能跟着感觉、随着人流接近一片红色的、欢乐的、旗帜的海洋。打听了一下，这里是长沙市委或是湖南省委的所在地。

我们也随着人们一起激动、欢呼，毕竟天下造反派是一家啊！

归心似箭，我们回到了贵州。

省城贵阳，“四一一”运动已经发展成全社会的群众运动，自然蔓延到全省各地县。兴义造反司令部在受兴义军分区“三一九”镇压时，就参与了“四一一”行动，兴义造反司令部为代表的造反派，自然汇入了全省“四一一”运动的行列；而我们的命运也与全省“四一一”的命运共同：被踏平、镇压；即便也有一时的反复，一些代表进入革委会，也逃不脱最后的全军覆灭！

## 我成了逃亡的“通缉犯”

1968年7月后，“四一一”兴义造司面临最严峻的考验。“独山事件”、“七二五抢枪事件”之后，武斗空气渐浓；李再含掌握的兴义地革委会抓紧收缴武器，一边实行镇压；张星炳力量依旧控制的兴义军分区，从来不曾有一天忘记过兴义造司——他们的“阶级敌人”。

我们深知面临的局面阴郁，前途艰辛。但是，经历过“二月逆流”的考验和全省“四一一运动”的斗争后，我们更加坚定了“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局势一天比一天严峻。安龙等各县保守组织的民兵占据了县城周边山头的据点。造司成立了应对大镇压的“六六兵团”。我们红闯兵也按造司的安排，做一些一旦遭受镇压时的武卫准备。

我们红闯兵成员虽然都是十多二十岁的孩子，但基本都出生和来自社会底层，原本就品质单纯、思想纯正。从1966年开始造反到现在，也和兴义造反派一起，经历了几次反复、几次内心的思考和斗争；所以，每到关键的时刻，我们尤为注重思想的磨练，在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聚在一起，分析形势、鼓舞士气，坚持斗争。

这天，我抄好了最后一张大字报，准备回家吃饭，计划晚饭后便组织人贴出去。

我独自回家的路上，与省革委李再含派到兴义的工作组组长带着的两个人擦肩而过。我认得他们，可他们不认得我。

我一回家，母亲就告诉我，刚来过几个人，见我不在家，就拿走了我在玻璃板下的照片。妈妈说，他们专门拿我的照片，一定是用来做通缉令用的。（右图：就是这张照片，后来是盘县的一位造反派冒险连通缉令一起从墙上撕下来送给周一筑的。）



我记起回家路上碰到的那几个人，于是，我饭都没吃，就离开了家。

他们肯定是要下手了。刻不容缓，当晚我就出城，由我们红闯兵女孩吕老毛（小名）的哥哥带领，把我送到城外他家的一个亲戚家中。

果然，当晚兴义城内进行了大抓捕。城外那坡通往外面的公路上，宣传车、警车的声音来来回回响了一夜。

白色恐怖再次笼罩兴义山城，整个“四一一兴义造司”再遭镇压，造司“六六兵团”、红闯兵被取缔，红闯兵头头王清亚、周一筑被全国通缉。

兴义已不容我久留。两个造司战友把我护送到马岭，然后翻过一座很大的山，后来知道叫“哇嘎”。他们送我到此，告诉我下山经过威舍、过河就是云南。然后，再从云南绕道北上，目的地北京。



这次上北京跟上次就不同了，这次是作为“通缉犯”逃出兴义的。北京，是唯一可以去的地方。亲历过文革的造反派都会唱这首歌：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迷路时想你有方向，  
黑夜里想你心里明……

这一段时间，贵州，尤其是遭到踏平的贵阳“四一一”，很多都唱着这首歌到北京，找党中央、找毛主席。这是唯一的信念，也是唯一的希望。

我独自下山，很快天就黑了下來。天黑走夜路，那时担心的还不是人身安全，我担心的是路不熟，会迷路，于是决定找个人家过夜，天亮再继续赶路。

随便找了一个农民家，只说是要到黄泥河镇，天黑了，想借宿一下。主人是个农村妇女，根本没多问，就答应了我的要求。

坐下来后，见她旁边有一条缝制中的衣服，看来她刚才正在做针线，我就顺手拿起来帮她缝，一边和她摆家常。

不一会儿，男主人回来了，但看起来神情有些不对；果然，随后跟进来两个干部模样的年轻人，他们进门就问我是谁，女主人即那位农村妇女回答：我家嬢嬢。

我没说话，继续做手中的针线。男主人，那位老实的农民也没有说话。更妙的是那两位年轻的干部并未多问，便离开了。

他们走后我才知道，上面来人，男主人是接到通知每家去人到队上去开大会的，内容可想而知。会后又每家清查外来人员。

刚才的场面，简直像我们熟悉的“老乡掩护革命者”的情节。没有他们心照不宣的掩护，我肯定当时就被带走了！但是我知道自己不能在这里过夜了，谁知道刚才的轻易过关，是不是他们怕打草惊蛇，回去反映情况后再来捉拿我呢？

我慌忙告别这两位恩人，连感谢的话都不知怎么说，就赶快逃离了。

好在当时的乡村道路并不复杂，而且也无人可以问路，我凭着大致方向前行。

路是乡村公路，并不算狭窄；但可能是两省交界的偏僻之地，路上坑坑洼洼，而且荒草丛生，应该很久没有人、车通过了。我独自一人走在这荒郊野岭的路上，又是在夜间，真有点地老天荒的感觉……

也不知走了多久，更不知是什么时候，前边隐隐约约出现一点一点、一堆一堆的火光。近了，看见前边是一处平坝子，远处可见房屋，看来是一个村镇。平坝子上那一堆一堆的火光，是当地农民在烧石灰。

我找到一个烧石灰的农民打听，知道这里是和云南相邻的威舍，心里有点落靠了：看来我没有走错，前面就是云南的黄泥河镇，我绕道北上的第一站。

我这第一站的目的地是黄泥河镇上的富源二中，有我小学和中学的同学董老琴（小名）家。

董老琴是我最好的朋友。她爱人和她一起在这所学校教书。我打算通过她这里到富源县，再到沾益，上火车到北京。

到黄泥河镇上时已是深夜，我想这时到同学家显然不方便，就决定找个地方捱过一夜，第二天再到同学家。汲取教训，不敢找人家户借宿了。

幸好我知道黄泥河镇上有个山洞，以前只是路过，并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山洞离路边不远，我想里面应该可以暂时待一会儿。谁知一进洞去，随着一阵“噗拉噗拉……”的声音，一群岩耗子（蝙蝠）从洞内飞出来，把我吓得不轻。原来我只顾自己找个避难之处，却干扰了洞中主人的正常栖息。

我再观看洞内的情况：黑暗潮湿、阴森恐怖，加上刚才的惊吓，哪里还敢再逗留！

离开山洞，我只得往学校而去，毕竟那是人待的地方吧。

当时的富源二中，前面是一个很大的操场，似乎没有明确的校门。我找到学校礼堂的所在地，心想该可以在这里呆到天亮了。

空旷的礼堂里什么都没有，肯定许久没用过了。谁知我刚安静下来不久，就听得礼堂楼上发出莫名其妙的响声，像是什么动物活动，更像是搬动家具拖出的声音，响声时有时无，时大时小，一直折腾到天亮……

好容易捱到天亮，我就在朦胧的天光里走出这神秘的礼堂，一直想不出那一夜的声音到底是什么。

整个学校静悄悄的，空无一人。这并非清晨时间早的缘故，我自幼在校园长大，知道正常时期，这正是晨练的时刻。

我找到了董老琴家，开门的是个女学生。进屋才知道，这个我没见过的女生是董老琴爱人的妹妹，叫小淑珍。我这个不速之客来得真不巧，小淑珍告诉我，她的哥哥嫂嫂回她老家云南大理去了。

我还是跟小淑珍说了我来的目的，希望她给我找到富源的便车。小淑珍答应帮忙。

学校里确实没什么人了，文革期间，学校都不正常，何况是这样一座地处乡镇的学校。中午小淑珍带我和另外两位女老师一起吃的饭，她们应该是一起开伙的。然后她告诉我，眼下还没有便车，要等一等。不过很快，大概只过了一天，就找到一辆到富源的货车，我坐上货车，还向小淑珍要了一件衣服和一个挎包。

顺利到达富源县城，然后又到沾益，打算从这里乘火车北上。想不到在沾益县城，又遇到了意外。

我也是第一次到沾益，打算打听一下火车站的位置，再吃点东西。

随便向街边一家住户打听火车站往哪里走，那住户是个老头，他告诉了我火车站怎么走，见我是个外地人，就客气地递给我一个板凳，要我进来坐下歇口气再走。

我接过他板凳坐下，远远地看他在屋里做饭吃。还记得他是在自己煎红薯片当饭，我当时觉得很新奇，便多看了一会儿。

谁知就是在我耽搁的这会儿，街上过来了几个人，一个男的，几个女的，盘问了我几句，就要把我带走。我紧张起来，一路上盘算如何应付。

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屋子里，我见并非公安或是政府机构，更像街道或是某个组织的所在，便放心了一点。

果然，他们开门见山问我：是不是四川的？我说我是贵州的。

慢慢地，我得知他们是把我当做有名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家的什么人了。

我当然不敢说出自己是从贵州兴义来的，就说是盘县的。话说出口，便心虚了：我说话不是盘县口音，如果他们发现，岂不露馅？

他们开始到另一边分析、商量，显然对我的身份也拿不准。

我这里也开动起我天生迟钝的脑子：他们怀疑我是四川刘文彩家的什么人，肯定事出有因——最大的可能是上面给他们有关通知，或是通缉令什么的。刘文彩，当时在全国名气当然大过一个地方的无名之辈。但是如果我不赶快逃离，他们就算定不了我是刘文彩家的，只要查下去，我的真实身份——通缉犯也要暴露。

我必须千方百计离开这里！

此时已近黄昏，已是晚饭过后的时候了，为首的几个人可能去往上汇报，留下几个看着我的，想来应该是一般人员。我想起在黄泥河那一夜，小淑珍出去参加过文艺宣传活动，她是云南“炮派”的，估计当时富源应该是“炮派”掌权。我就和他们攀谈，告诉他们，盘县我们那边是支持“炮派”的，我昨天晚上还参加了黄泥河“炮派”的文艺演出。我还拿出在盘县挑水的一张水票给他们做证明，我想先让他们相信我不是四川的就好。果然，这几个人有点相信了，脸上表情明显有所变化。我接着就说，我有东西掉在刚才那位老头家里，央求他们让我去拿回来。他们也同意了，但须一个人跟我去拿。

老头家不远，几步路就到了。正巧老头不在，好在门是开着的。我不熟悉，当然只有跟我来的那人去问、去找老头了。我急忙趁此机会，穿过老头家，从后街逃走了。

我从后街逃出，七弯八拐离开是非之地，找到了火车站。

老天再次眷顾我，刚好有一列火车经过，顾不得车次和方向，我忙爬上火车。当时的客车上乘客都不多，在车厢坐定，得知还是一列往北的客车！

此时惊魂落定，才感到饥肠辘辘。

想起离开兴义才三天，两次有惊无险……

### 在武汉找到贵州“四一一”

我仅买了一个大站的车票，乘上往武汉的列车。这是一列快车，我知道查票会相对严一些，可我买不起终点站武汉的车票。

列车员又来查票了，我拿不出车票。可是，坐我对面的一位乘客给我作证，说我上车时，他看见我有票的。是的，他说的不错，我上车时是用口叼着火车票上来的，所以他说看到了我的车票。于是列车员信了。我想，列车员一是相信我作证的这位乘客——那是一位五十岁左右、干部模样的男人；二是相信我，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

这样的事，今天是不会有了，但却发生在那黑暗的“浩劫”年代。搞“阶级斗争”时没有人可以相信，一旦离开了“阶级斗争”，人的本性总愿意呈现出善的一面。

本次列车终点站武汉火车站到了。从车上下来，告别了那位打算帮一个丢掉车票的姑娘，却不想帮助了一个“通缉犯”的好心旅客——看来“阶级斗争”是有些复杂啊。

此时天色已晚，发现武汉车站站内有些混乱，我便独自走出车站。我必须赶快过江去，按“京汉街5号”的地址，找一个名叫杨友贺的人，联系上流散在武汉的贵州“4.11”，以便继续北上进京。

出得站来，正好遇见一群年轻女孩，看样子是外出后回家。我便上前问路，她们很热心地带我到公交车站，告诉我坐到长江大桥，然后转车便可过江。我向她们道了谢，便上了公交车。车刚要开动，只见她们一齐在车下十分着急地向我招手，要我赶快下车。

我十分疑惑地下得车来，她们告诉我，我上车后她们才想起，这个时候坐车到长江大桥，过桥的车已经没有了，到那时我便进退两难。她们见我为难的样子，就像多年的老朋友似的，关心起我来。我也告诉她们，我是要到对岸京汉街5

号去找一个武汉的朋友，然后，她们就主动提出，可以去她们那里住一夜，第二天再去找朋友。

我自然喜出望外。便跟着她们走了。

于是我知道，主动和我说话的姑娘叫周文秀，高中六六届红卫兵，另一位她的朋友叫谢菊香。她们让我当晚去和谢菊香住。

我跟着谢菊香到她的住处，原来她是个印刷厂的工人，跟周文秀是同学和好朋友。我跟着她弯七拐八穿过一个院子、再上一道坎子，到了一个院落，看来是他们厂的工人宿舍。

第二天谢菊香把我交还周文秀，因为她要上班。周文秀家住的地方是个工人宿舍大院，一排一排的平房，用现在的标准看是典型的棚户区。她的父母都是工人，出门上班时头上戴着安全帽。

周文秀对我仍像昨天一样热情。她家还有两个弟妹，他们几姊妹在洗头，她的父母根本没问我是谁，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好像我和他们早就相识，或者就是一家人似的。我跟她简单讲了我们贵州文革的事，告诉她贵州“四一一”在武汉有个联络站。于是她也谈起了武汉的情况，还提议带我到武汉大学去见她的同学。

周文秀带我去了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在武汉东湖旁边，整个学校建在一片丘陵里面，琉璃瓦的中式建筑被松林掩映着，而且我们是走过很长的道路，才到达这片书斋的，可见它还远离了尘世的喧嚣，可真是读书的好地方。

可文化大革命却没能让这里与世隔绝。不过我们去的时候已是清华“七二七”之后，这里昔日的红卫兵已同北大、清华的红卫兵一样被去掉了头上“革命小将”的光环，正在为自己命运的去向担忧。

然后，我告别周文秀，过江去找杨友贺。

京汉街5号很好找，就在武昌火车站后面的一片棚户区里。开门后我见到的是一个年轻妇女。她回答我这里正是杨友贺家，便把我迎进屋里。

我问：您是杨友贺的姐姐吗？

她点头，并告诉我杨友贺不在家。大概她也不知道杨友贺去哪里了。

当晚我在他们家过的夜，我当天没见到杨友贺。杨友贺的嫂嫂(我把她当成姐姐了)还让我睡前冲了凉。

第二天一早我才见到了杨友贺。这位中学66届的红卫兵是个朴实的工人子弟。他的家庭应该是铁路工人家庭。

他告诉我，他们昨天是去林彪故居参观去了，所以很晚才回来。然后他就带领我到中央民族学院武汉分院，那里有贵州“四一一联络站”。

这天天气很好，我们心情也不错。杨友贺又带我乘渡船过江。江边人不少，是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的缘故。杨友贺还告诉我毛主席是在什么地方畅游长江的。

到中央民院武汉分院很顺利地找到贵州“四一一”的人，都是贵阳的大学生。一位男生是贵大的，另外一位女生是贵阳工学院的，是位印尼华侨，个子很大，现在很难想象：我晚上居然和她挤在一个行军床上睡觉！

我还见到一个我们兴义一中的校友，这位同学是初中毕业考到这里读中央民院预科的。他还立即到食堂打了一份饭给我吃。

听他们谈昨天参观林彪故居的情况，看来他们情绪不错。

第二天，杨友贺他们好几个人，护送我们一些人乘上开往北京的火车。我们（其他几个人我并不认识）一群人被带着先通过铁路内部的列车，进入火车站内，然后由列车上的人把我们带上车，我们便和护送来的杨友贺他们告别了。

武汉一别，以后我再没有和杨友贺见面。后来通过几封信，知道他不久就到洪湖插队去了。

我忘不了在武汉的这一段难忘的经历：周文秀、谢菊香、杨友贺……他们的面容在我的记忆里模糊了，但他们的名字却永远铭记在我心中，经常显现。

我还曾经用“京汉街5号”为题写过一篇小说（未发表），至今我都在想着：他们后来怎样了？现在哪里？我能用什么方法找到这些武汉好心人吗？

## 这一次在北京感受到的是严寒

有武汉战友的帮助，我顺利到达了北京。

此时的北京城，已不再是逃亡造反派的避难所。伟大领袖派出的“工宣队”进驻北大、清华等高等院校，清华的“七二七事件”后，贵州“四一一联络站”栖息地都成了问题。尽管全国20多个省市造反派汇集北航，但造反派显然已得不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庇护，“北航黑会”的阴影笼罩在造反派心头。

我虽然到中央文革递送了材料，但这回再也找不到1967年春天在同一个地方告状被亲切接待的感觉。

曾经让我们住宿的文革接待站当然是没有了。我住在舅舅家，表妹也在家里，等待着上山下乡的命运。我联系上了在北大参与贵州“四一一”活动的“小兴义”邓家胜。他们当时生活都十分艰苦。

我利用舅舅家的条件，接送材料，直到我离开后，贵州、兴义的材料也送到这里传递。

一天我同邓家胜见面，一起爬上安定门城墙，想开阔一下视野，放松一下心情。我们交换信息，相互鼓励。

我放眼安定门城墙下的古都：街道、人流，一切都是这样平和与安详，无法使人联想到清华校园内武斗的凶险，以及“两条路线斗争”的残酷，更无法预知下一个“反复”的波澜。

身为“通缉犯”的我，当时并不为自己的命运担忧，满心思虑的是当前这运动的走向、造反派的前途。我想，这种精神状况，就是贵州乃至全国遭到镇压而跑到北京，在北大、清华汇集的“四一一”以及全国造反派坚持斗争的原因。大家早就把自己的命运和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然而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舵手，我们的伟大领袖此时考虑的是什么呢？

1968年9月5日，《人民日报》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为题，欢呼新疆、西藏两自治区同一天最后成立革命委员会，至此“全国山河一片红”。

看起来，“全国山河一片红”，文化大革命应该是大功告成了！

然而，这是“四一一”和全国造反派为之奋斗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底”吗？

一方面，是红卫兵运动落幕，全国20多个造反派组织在北航开会分析“全国文革形势”被斥为“北航黑会”；另一边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全国山河一片红”……

这其中的联系，又在哪里？

以后，在北京的贵州“四一一”有的决定回去开展斗争，部分人员回了贵州。

这时的兴义，文革以来的三派博弈中，李再含对“四一一”造司的镇压步步逼紧，“独山事件”、“抢枪事件”、“一二·一五事件”的大镇压，使局势日趋严峻，群众组织头头均被抓进各种监狱……

而我这样一个“通缉犯”，此刻回去只能进监狱。

1968年的国庆节，我是在北京度过的。表妹到天安门去接受检阅了。她说，因为他们马上要离开北京上山下乡插队去了，所以这次天安门的游行，特别安排他们面向天安门的位置。

天安门的国庆游行等庆祝活动，我当然不能参加；除了规定的人，其他人都是不能参加的，许多地方都戒了严。只有到了晚上。节日的焰火射向天空，人们才得以远远地观看。

我还是第一次观看焰火，而且是在北京，是国庆节的焰火！

看着天空绚丽的焰火，我不禁回忆起 1967 年在长沙的那一夜……那一夜并非节日，天空亦并无焰火，只有一阵阵的炮竹，那是造反派战胜“二月逆流”，宣告胜利，继续斗争的礼炮。因此我感觉那才是真正的节日！

这一段时间，贵州“四一一”乃至全国受压的造反派面临的形势严峻；兴义地区李再含的代理人“一面打左，一面打右”，兴义形势日趋紧张，以至发生后来的“一二·一五”大镇压……

舅舅一家在为表妹面临的前景充满担忧。舅舅和舅妈年纪都大了，只有表妹一个女儿，当时表妹才十多岁。这老一辈以后的生活，小一辈的前途，这一切将会怎样？我能够感觉到舅舅家压抑的空气。

### 在周官屯乡间的体验

一个寒冷的冬天到来了。我去了离北京城不远的献县农村周官屯，我姥姥家。

献县属于武术之乡的沧州地区，《水浒》中林教头林冲发配、火烧草料场的所在。听母亲说过周官屯尚武，我姥姥家还有一张祖上留下的强弓，据说后人没有谁能够拉得开。

然而我在这里看到的只是穷困，哦，还有人们对穷困的忍耐。

我在周官屯还有两个舅舅、几个表哥、一个小表妹。

小表妹当时是十二三岁吧，是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晚上和我睡一炕，就爱缠着我讲故事。她看什么都有兴趣，还极具表演天赋。她学小猪在门槛上蹭痒痒，把我笑得伸不了腰。

她带我到附近的小集镇和成街赶集，我用五分钱给她买了一个油饼，可她舍不得吃，说带回家去，切碎了放到菜里，就一锅菜都有油汤了，就这样一家人都能吃到油水了！

这种节俭，是从小养成的。小孩子出门，捡到一粒粮食，或棒子（玉米）粒、麦粒、豆粒，都要带回家去的。

我在南方贵州农村，从小就亲身体验过乡下农民的辛苦。在这里，在北方农村周官屯，我学着用铁锹翻地，和表哥天不亮就下地劳作。我还学使用独轮小车，是我以前在电影里看到农民运粮食送公粮的那种。每天从地里回来，全家人搬柴禾的搬柴禾，推磨的推磨，喂牲口的喂牲口，一直要忙到天黑尽（什么时间是不知道的），才能坐下吃饭。



一天忙到黑的辛勤劳作，吃的以棒子为主的粗粮：棒子饼子、棒子粥。油水基本没有。我还记得一回舅妈带我去走亲戚，回去时表舅妈追出来，塞了一把棉花籽到舅妈怀里，让她带回家捣碎放进菜里当油。

我的另一个舅舅知道我来，一定要请我去他家吃一顿饭。到了他家，请我吃的是用棒子面做的片汤，名叫“戛戛汤”。我吃得好香，不知道他们怎么能把粗粮包谷面擀成面片做汤，而且片片成型不化在汤里！

周官屯是一个很大的村子，舅舅家住在村子边上，我一直都没有把全村走完过。村子里自然也有革委会。我参加过一次全村的群众大会，照例开会前要集体“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可这里“祝愿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时，“林副统帅”前面还要加上一个“最好的”三个字，不知为何？

一天，革委会的人找到舅舅家专门问我的情况。开始我有点吃惊，后来知道原因：我出来时带了一张盘县县革委的证明，是盘县进县革委当常委的“四一一”张光来给我的，上面的名字是“张静”。这张证明当然要给周官屯的革委会看了，结果就是这个“张静”的名字惹出事来，因为舅舅曾经告诉过村里人，我姓周；这显然和证明上的不对号了。

我只好说我在到北京的路上出了错，误把同学的证明弄差了，答应找回自己的《证明》给他们看。

这种谎言居然也应付了，或许是他们碍于舅舅的面子——舅舅在村里辈分高，或许是他们“阶级斗争”观念不强，亦或是朴实农民的个人感情超越了政治？

我离开周官屯的时候，舅妈借了一碗麦子面，给我烙了一张饼。

## 终于可以回家了

这一段时间，文革进入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群众造反运动不再得到鼓励和支持，上层斗争围绕“九大”召开前后展开，全国上下、贵州省内都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局面。造反派已经明显走到末路，但许多人并未认识到这一点，而且既已身陷其中，就不得不像过河卒子一样，只有继续向前。

在这样的形势下，小小的兴义地区，李再含的势力和兴义军分区张星炳势力的矛盾显现出来。而此时，“四一一”兴义造司从组织上已被李再含完全镇压下去，他能腾出手来对付张星炳的“三一九”了。

李再含通过他控制的兴义地革委，把手伸向兴义各县，各县造反派陆续有代表进入革委会，使兴义文革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1969年4月份，地革委给造司“罗、王、林”平反，罗安义、王清治、林家伟得以释放。

消息传来，我终于可以回去了。我先到贵阳，找到了兴义造司在省城贵阳的人，和大家一起坐车回兴义。大客车应该是专门从兴义去接我们的。车到马岭，马岭“全无敌”（造反派）的农民到路边迎接我们，他们还专门问到我，问：“周一筑回来没有？”车上的人们立刻说：“回来了，回来了的！”并让我到车门边给大家看看。我记住了素不相识的农民造反派看我的目光是那样亲切。

一个“通缉犯”，却变成了老百姓心中的英雄。我还听过关于我的传说，说我双手都会打枪……这已经超过了文革的思维，显然受了文革前的小说和电影中“双枪老太婆”故事的影响。我想，编出这种故事的老百姓，根本是不懂文革的，但是他们懂得公平、正义，于是他们选择了当造反派。

有一次我走到大街上，一个不认识的人跑过来说：周，我们听说你从长江大桥上跳下去了呐！

关于我的故事，居然还有一个这样悲壮的结尾！

### 第三次到北京：等着我的是监狱

1969年回到兴义后，“四一一兴义造司”根本缺乏对全国大局势的分析，还是按造反运动高潮时期的思维安排工作：排演革命现代戏、编印《造司战报》、整理兴义文革资料……全然不知随着北京红卫兵运动的落幕，整个造反派正在退出历史舞台，“造反有理”的群众运动也该落幕了。

李再含下台，蓝亦农、张荣森主政贵州。部队换防，新的人马进驻兴义。兴义造反派听说，这支部队是镇压广西造反派“四二二”的，人称“老广兵”。

很快，“清队”、“一打三反”等各种整群众的运动接连不断，随着一个接一个的各种运动，社会各阶层的群众都去了该去的地方：有的去了“学习班”，有的到“五七干校”，有的直接进了监狱……与此同时还有中学生上山下乡，城镇居民疏散到农村……

我知道自己的下场和归宿，便又开始了逃亡。

这一次显然不同以往；随着部队换防，军队在各地的作用已经不是什么“支左”，而直接是军政府主政。此时省内各派头头和有代表性的人都被集中在北京办“学习班”，兴义造反派代表罗安义也在内。如同前两次那样到北京告状，还有意义吗？

这次是真正意义上的逃亡。

我是暂时逃走了，我的母亲又身陷牢狱；就连已分配到盘县特区工作的弟弟，也被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先让他从盘县回兴义处理家庭财产，当他坐上回盘县的客车，兴义公安局局长李兴堂便坐公安局的小车同行，在盘县客车站把我弟又抓回兴义，后来关在地区看守所，而我母亲被关在县看守所——不知抓到我之后，会把我关到哪个看守所？

后来我才得知，他们对贫下中农的兴义独山农民，抓的抓、关的关、判的判、杀的杀……在这之后，还毁掉他们的家园，把他们的老人子女从自己家园赶走！

如果这是“阶级斗争”的话，这是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的斗争呢？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到底是谁在革谁的命？

四处逃亡一年多，我第三次到了北京。这次与其说是告状，不如说是去投案。可是，极具荒唐、充满滑稽意味的是：这是投的什么案呢？

这个案，就是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案。

我们的面前，显现出两个“文化大革命”：一个，是属于伟大领袖的，这个“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人们已经看到了；还有一个“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从伟大领袖的那张大字报传到社会上开始，从“造反有理”成为一个可以公开呼喊的“革命口号”开始。这个口号后面还有一句“造反到底，就是胜利”，我们这个文革胜利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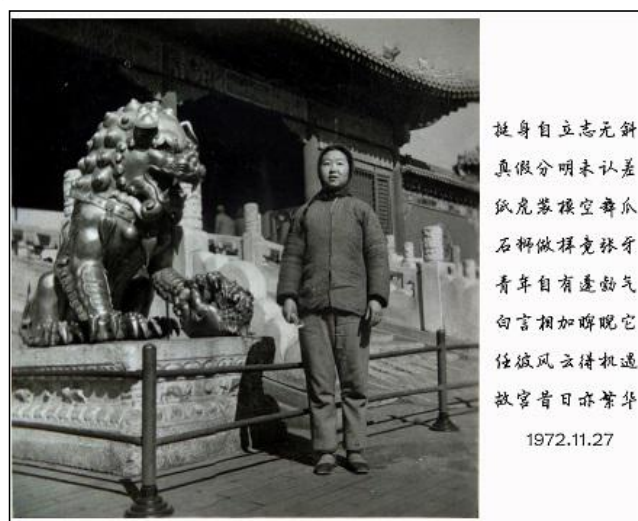
1971年春节后，我到了严寒中的北京。

我在北京火车站呆了一夜，因为那里有暖气。如果我出了北京站，说不定会冻死。我也不会到安定门内舅舅家去，因为我不是来避难的。

天亮后，我才走出北京站，无目的地走着，内心十分茫然。结果鬼使神差地来到故宫门前，

在一个有一对狮子的门前照了张像。（见上图，照片旁是周一筑姥爷 1972 年逝世前为其题写的勉励诗：挺身自立志无斜，真假分明未认差。纸虎装模空舞爪，石狮做样竟张牙。青年自有蓬勃气，白言相加睥睨它。任彼风云待机过，故宫昔日亦繁华。）

下午，我找到一个邮局，坐下来，准备材料，打算整理后再去递交给中央文革接待站。我当时甚至没想过这个接待站还在不在，也完全没有想到中央文革这个机构已经不存在了。



使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在邮局坐下来不久，就被人报告到派出所。可见，北京的运动搞得很紧，“群众专政”也很严了。

到了派出所，我自然通报了我的姓名和地址。派出所那位警员或是警官得意地说：我几分钟就能证实你的身份！

弄清就弄清吧，我一点都不在乎。我们一家三口，已经有两个在监狱里了，我还怕也进去吗？

想不到的是，竟然没把我押回兴义，兴义也没人来抓我。

来的是警车，我第一次开洋车坐进了警车，有铁丝网的那种。这警车把我带到了一个所在，明显是一座古代的建筑，但灰色的砖墙丝毫没有京都的皇家风范。他们收走了我随身的挎包，还让我脱了衣服彻底检查了一遍，然后把我带进牢房。

显然这是一座很有规模的监狱：牢房是铁栅栏的结构，中间一个圆圈，然后周围有若干个通道，通过铁门进入通道。通道两边便是监房：每个监房四道铁门铁窗。

我进的监房很窄，宽度就只能放下他们丢进来的一床被子。我记起曾经读过的一篇课文，是从一个革命者伏契克写的《绞刑架下的报告》里节选出来的《267号牢房》一节，他描写他住的牢房：从门到窗户是七步。我量了一下，我的这间牢房还没有七步。以后了解到，这是单间，多人间要比这间大。后来我就被转到了多人间。

一关进牢房，被封闭的不仅是空间，还有时间。因为这里完全与世隔绝，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

## 狱中所知的社会百态

后来知道了：这里是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路一号的“功德林”。“功德林”原来是北京城德胜门外的一座庙宇，清朝末年，朝廷在此创设“京师习艺所”，是中国第一个劳改机关。1915年更名为“京师第二监狱”，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期间，司法总长罗文干最终完成了这座监狱的全部改造，后来成为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是在这里被杀害的。1949年后，这座监狱被公安部接管，成为关押和改造战犯的一座“战犯管理所”，占地近百亩，监房能容纳千人以上。

我后来读过一本长篇报告文学，叫《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上面讲的“战场”就是这个地方。书中写到的“三角地带”，就是两个通道伸延形成的地带，其中的那口井，我后来也看到了。

这座曾经关押重犯的监狱，这时关押的人来自全国各地，什么身份都有。随着一个一个运动的深入开展，各地蒙冤负屈的人也越来越多，还都以为像文革初期那样到北京告状，没想到形势已经完全变了，北京这里已经不再“接待”，而且开始“截访”，发现是告状人员就先都关起来，再慢慢往各地送。

当时的隆冬气候，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所给的一床棉被又脏又臭，但也只得把它紧紧地往身上裹，有时还是几人共用一床。吃的是每顿一碗白菜汤，一个玉米窝窝头，一天两顿。在这里，任何人同外界都没有联系，是不可能有人接济的，好在许多人都少则半个月，多则一两个月就被送走。只有我，在那里一直吃了好几个月的窝窝头。

平时大家都关在自己的牢房里，集中起来听训话和读文件只有极少时间。在此期间我认识了一个苏州的女孩，名叫刘芳，是个造反派。我们当然不能多交流，只是相互交换了姓名地址。后来我们通过信，知道她后来结婚去了盱眙，她还在信封里给我寄过有机玻璃扣子。

这里只管关押、送走的任务，不管案子的。所以关在一起的人，有案子也不会谈论。

因为关押的时间长，我接触的人较多。开始有一位中年妇女，老家是河南农村的。她跟我摆谈，她是1960年饿饭的时候逃荒去了新疆。从她的摆谈中我知道了荒凉的新疆，骑毛驴走几天几夜才见一个村庄。而河南人居然到那里去逃荒！她告诉我每天早上一大早去抢着买牛头，因为牛头便宜，而且肉特别多。新疆比起河南，大概油水多是他们选择的原因吧。

还有一位年纪稍大一点的妇女，看样子是个知识女性，北京人，但那时他们一家的户口已经不在北京了。他们一家被遣送到了唐山，她虽然没有说，但能够设想出若干他们遭遣送的原因。他们是私自倒流回京被发现，然后才被关在这里，等待遣送的。据她的述说，他们已经是第几次被关押遣送了。我感到，她是在用这种方式进行抗争。她谈了他们每次回北京都怕被发现的提心吊胆，他们每次在这里，她和丈夫被分开关押、相互挂念的心情……但他们还是选择不断逃回北京这种方式来同命运抗争。

还有一个农村老太太，年纪已经很老了，是湖南乡下的。她的湖南话人们都听不懂，是另一个懂湖南话的人向我们讲了老太太的故事。这个老人的家乡是湖南的一个老革命区（地名因语言的原因不很清楚）。年轻的时候她的丈夫就跟着伟大领袖参加了闹革命。以后的过程她当然不会清楚。她的丈夫，一个老革命，如今在刚刚召开的“九大”上当上了中央委员。有人当时拿出“九大”的一个小红本子，上面果真有老人说的那个中央委员的名字。于是她便千里寻夫，来到了北京，并且还找到了她的丈夫。

于是她便被送到了这里，等待被送回原籍。

听到这个故事的人都唏嘘不已。

我看着眼前这位表情木讷、目光迟钝，一身蓝色粗布衣衫的农村老人，她可能还不知道我们在议论她的故事呢。

其实，这种陈世美的故事，就在当时也没有什么奇怪。只是大家所议论的，是那位“九大”的中央委员：这种事用什么办法不好，要用这种文革的方式解决？

功德林监狱里，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使我当时就内心充满疑惑，至今想起还不能忘怀。

一天夜里，一个声音把大家从梦中惊醒。那声音是个年轻男子的声音，标准的北京口音，而且嗓音浑厚，共鸣很强，非常具有魅力。

更使我惊异的是他的话里感情悲愤，内容却是：姐姐们、妹妹们……妈妈呀，妈妈呀……

反反复复，没头没脑，就这样几句话，但那情感的悲愤，余音的凄厉，直击人心。

我惊异于这其中不知出自哪里的摄人心魄的恐怖……

我在这所古老的监狱里，当时是个最受优待的囚犯。可能是我呆的时间长，或是觉得我还不具危险性？

于是我就在功德林当了几个月没有工资的勤杂工。

我这个勤杂工的工作也真够杂的，还是在冬天，手冻得发僵，却要去捏煤球，供管理人员取暖的煤炉子用；管理人员的办公楼是在功德林牢房以外，单独的一栋楼，我经常要去那里打扫卫生。其实这些，根本不是我的长项。他们倒是愿意教我——拖地板，我就是在那里学会的。

天渐渐暖和了，我就可以经常出监房，到通道之间的三角地带干各种杂活。那里的那口井，我就是那时候看到的。

也就是这样，我在那所古老的监狱里，才度过了四五个月的牢狱时光。

## 文革“全面胜利”，我已没有家

终于，他们把我送回贵州。

我在北京的功德林真是与世隔绝，完全脱离了世上的文化大革命，许多运动，都无缘参加，应该也躲过了不少的批斗。回到兴义，我的造反派战友们，该关的关了，该判的判了，该杀的，也都杀了。除了关的判的杀的，也都下乡的下乡，遣送的遣送，闹了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风头过去了，天下太平了，大概顾不上再拿我开刀了，便把我关到了城关派出所里，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全部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牢笼。

我在城关派出所里，一关就是五个月。这段时间，我依旧与世隔绝，可能也没人知道我被关在这里。

终于有一天，那位设计亲自把我弟弟从盘县客车站抓回兴义的兴义县公安局局长李兴堂，来到城关派出所。他带来了我的户口册。我说：你们把我的家毁了，你们现在让我去哪里？他说：你有的是去的地方！

于是我不像是被释放，倒像是被赶出了城关派出所！

我用一个塑料网袋，提着我的户口册，离开了城关派出所。

我的文革生涯结束了。我的文革，到此划上句号。

然而，我的母亲、弟弟，我的一些同志、战友，都成了阶下囚。除恢复运动初期的罪名之外，依据运动的需要，各式各样的罪名随手拈来，一串一串，而且还堂堂皇皇的，用这些编织的“罪名”给他们判了刑。

从派出所出来，无家可归的我，被罗师母——罗安义的母亲收留。她和我一样，一家三口，有两口——罗安义和他父亲罗仲民老师都在监狱里。

在罗安义家的茅草房里，我居然翻到几本民国时期的杂志，应该是罗安义的大哥，罗安仁留在家里的。我从中读到这样的诗句：

“织成白絮桑重绿，割尽黄云稻又生”。

这是何等开朗、豁达的心胸。这揭示的是大自然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吗？但是，大自然也好，人类社会也好，就只能是这样周而复始吗？

于是，这本来使人眼前一亮的自然景象，在我的面前变得模糊、昏暗……

以我当时的阅历，只能联想起 1949 年以后的各种运动：……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 年“反右”、“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每一次完了以后，又用新的名目再来一遍，每次都只能是这样的结果吗？我想到我从修公路工地上回来投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年的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反击“二月逆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错了吗？我们错了吗？

兴义军分区张星炳和他的“三一九”革委、“西南春雷”李再含和他在兴义的地革委、“蓝、张时期”老广兵主政的军政府……这就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的，现在的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反革命”，比运动初期多多了！这又是一次“引蛇出洞”吗？

难怪这么多人认为是受了蒙蔽！

我回顾了自己，以及我身边的战友：我们开始造反的动机，我们的整个心路历程，我不承认是受了蒙蔽，如果再来一次，我相信我还会造反！

我也不认为数以万计的人民群众的造反运动，可以用一个“受蒙蔽”来解释。数以万计的造反派追求公平正义、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从来就是不容否定的，而且这种斗争，应该是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

然而，今天的结果，应该揭示一种什么规律？

我居然买了一本有关巴黎公社的书，想从世界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巴黎公社在法国没有重演，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总结这段历史的。

人们都熟悉的伟大领袖的诗中有这样一句：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然而这沧桑正道，又在哪里？

从我走出城关派出所，我的文革生涯就结束了。

至于文革，当然并未结束。

就全国来说，各种运动依旧；就本地区而言，“阶级斗争”更不会消停。但这一切，已经与我无关。我的当务之急是要生存下去。

幸而我还能在罗安义家暂时栖身，于是在短暂的休整之后，就到处找临时工做，起初是干搬运工——扛着一百斤重的水泥包上下大卡车；然后在偏僻的农村，当了一名代课教师。

跟我的一些同学、同志、战友、亲人，那些被杀的，还被关着的，还有被以“知青”和“城镇人口疏散下放”等各种名义流放的比起来，我应该是最幸运的了。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于我这样曾经热情万丈的“红闯兵”来说，居然不再产生应有的激动。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我弟弟、母亲于1977年、1979年先后无罪释放，我的一些同学、同志、战友们也陆续走出监狱，或回到城里，人们恍然大悟：

亿万民众全身心投入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原来是一场“十年浩劫”啊！如此众多的民众当初造反是“受到蒙蔽”了！

走出“浩劫”和“蒙蔽”的我，后来当了一名教师，直到退休。

2019年2月26日搁笔

2019年5月27日改订